

---

## 【特别推荐】

- 改革开放的三个历史节点……………徐光春（1）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若干思考……………周新城（2）

## 【本期关注】

- 改革开放以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王爱云（7）  
理直气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王玉周（14）

## 【亲历者说】

- 我所经历的企业整顿与改革……………袁宝华（19）  
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林重庚口述 苏国利、吴素萍整理（25）

## 【史海烟云】

- 回望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王扬宗（35）  
中国空军发展预警机的艰难历程……………陈 辉（39）

## 【人物春秋】

“万方乐奏有于阕”

——毛泽东看少数民族文化……………陈 晋（47）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张 曙（49）

8 月 15 日印刷

第 10 卷第 4 期

---

**【海外反应】**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七种叙事·····戴维·凯利（52）

**【报刊荟萃】** ······（54）

- |                         |                              |
|-------------------------|------------------------------|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    |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代启示         | △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社会的历史”          |
| △人民政协职能演变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   | △改革开放 40 年：全球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实践    |
|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制度逻辑与治理思维  | △新中国成立后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经验与启示      |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
|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发展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                |
| △社会主义革命语境下的精神生产：政治宣传画   | △1999 年“炸馆”事件中的我国外交危机决策机制与过程 |
| △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考察         | △大变革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的参与          |
| △“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 |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要目及摘要 ······（61）

【特别推荐】

## 改革开放的三个历史节点

徐光春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 第一个历史节点是改革开放的起跑点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力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星火从农村开始点燃，烧遍中华大地。当时，我正在新华社安徽分社当记者，在那改革如火如荼兴起的日子里，我挎着相机揣着笔，跑遍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安徽农村的山山水水、七乡八村，倾诉百姓的心声，记录乡村的变化，揭示发展的真谛，接受改革的洗礼。

### 第二个历史节点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加油站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一时间改革的声音弱了，开放的步伐小了。就在这时，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谈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深刻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涉及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

论断，为改革开放加了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当时，我在光明日报社任副总编。1992年2月的一天，我正在报社值班，接到我的老同学、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的电话，他说他前些天随小平同志视察采写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经小平同志办公室同意，今天已在特区报全文发了，可否请光明日报转发一下，以扩大影响。我一听，这是大好事，请他把当天的报纸通过飞机航班立即送过来。当天晚上我拿到特区报，怀着渴望的心情认真读了一遍这篇报道，当即决定光明日报全文转载，明日头版见报。于是，光明日报作为中央大报在第一时间向全国人民传播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这以后中央和地方各新闻单位在中宣部的部署下也陆续转发这一报道。

### 第三个历史节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最大限度集中全党

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当时，我专门撰写了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论文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新思想新实践》，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42位著名学者纵论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一书，以推动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出现的这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揭示了一个真谛：改革永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摘自《北京日报》2018年3月5日，原文约1500字）

## 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若干思考

周新城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谈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

邓小平根据“文化大革命”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发展是硬道理”，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依靠谁来发展？发展是为了谁呢？习近平总书记用“以人民为中心”明确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是为了人民。

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这

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世界上所有持唯心史观的人都主张历史是帝王将相、天才思想家创造的，广大劳动人民只是听人支配的群氓，不起什么作用。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因此，他们把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少数“精英”。唯物史观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物质生产的历史，它是由广大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创造的。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教科书把群众斗争只看作是实现计划的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指出这“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我们讲发展，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忘记人民群众，而指望少数“精英”，是发展不起来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

个基本原理。

然而，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往往忘记这个基本原理。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有一个市为了发展经济，专门发一个文件，提出“企业家老大”的口号。这就值得分析。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企业家”是要作阶级分析的。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他是为满足人民需要而工作的，也有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企业家，不管是企业主本人还是被企业主聘用来的，他总是为追逐最大限度剩余价值而奔忙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追逐剩余价值的企业家身上吧。即使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也需要摆正位置。毛泽东指出：《国际歌》歌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毛泽东在谈到谁创造历史的时候，谈到依靠谁的时候，总是强调是“劳动群众”。那么他是不是忽视领导的作用呢？不是。但他把领导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加工厂”，基础是群众的实践。劳动群众的活动是根本的。他主张，一切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群众路线，它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领导的决策必须来自群众的实践，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是我们正确认识的来源。离开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教导，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

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大跃进”以来党内生活的经验，对于如何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走群众路线，实质上就是发扬民主的问题。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足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加工厂”这个提法生动地表达了群众路线的内涵，表达了领导与群众的真实关系。现在人们喜欢讲“顶层设计”。这是借用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对“顶层设计”需要作具体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众创新、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领导机关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出完整的、科学的方案，那是完全正确的。这种“顶层设计”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加工厂”。绝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少数精英离开群众实践，关起门来主观地搞一套“制度设计”。

群众的实践是我们制定一切工作方案的基础和依据，只有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决不能说“领导是老大”，领导说了算，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国有企业里，也不能说“企业家是老大”，经理说了算。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

点，把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到国有企业的管理中去，就是他提倡的“鞍钢宪法”。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国营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基本上照搬苏联的“一长制”。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一长制”没有体现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没有体现工人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他十分欣赏鞍山钢铁公司提出的企业管理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把它称之为“鞍钢宪法”，要求全国推广。“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是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发展生产必须依靠工人群众。具体说来，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管理人员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对工人来说，要保证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真正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提出“企业家是老大”，违背了劳动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只有坚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大众是发展的动力，依靠他们谋发展，才能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另一个含义是，发展是为了人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利。假如像某一位党建专家说的那样，共产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就不可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了。这种说法违背了党的性质。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

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在第二次国内战争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仍然主张“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又强调“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要“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要保障群众的生活，“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强调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民生是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指南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指出的：“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人民，就会失去生命力。”“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

谈到改善民生，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首先，发展经济是改善民生的前提

和基础，没有发展，谈不上改善民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水平来追求高消费。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有可能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永远不能忘记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富裕了也要坚持艰苦奋斗，不能堕入好吃懒做、追求奢糜生活的泥坑。其次，要树立社会主义的利益观，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存在个人利益，还存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然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在具体利益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的一面。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一项重要任务，处理得好，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处理得不好，就会引发各种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毛泽东提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即“统筹兼顾、统一安排”，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适当的安排”。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我们在强调民生问题时，必须坚持这种社会主义的利益观，不能有片面性。按照这种利益观来处理利益矛盾，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切实保证共同利益的实现，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前提和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

才能实现。

任何剥削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剥削阶级为中心的，劳动人民总是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这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在社会关系这个系统中，生产关系是基础，它决定政治、法律、思想等全部上层建筑。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性的，它决定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在整个物质生产中就占有优势，在私有制条件下，有人占有生产资料、有人丧失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就有可能凭借生产资料来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生产的目的是服从于生产资料私有者的利益。生产资料私有者是整个社会的中心。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在生产资料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们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来参与分配，人人都必须进行劳动才能获得生活资料，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排除了剥削的可能。生产的目的不再像旧社会那样满足剥削者的需要，而是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在公有制条件下，发展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这就为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了基础。

所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我们不得不保留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在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内，还不可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但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需要的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

范围会越来越扩大。我们必须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城市，要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在农村，则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可以逐步覆盖全社会。

现在，有人一面大谈以人民为中心，一面却对发展公有制经济毫无兴趣，甚至主张私有化，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对这样的“两面人”，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保障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这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保障。在旧社会剥削制度下，政权不归人民所掌握，那是怎么也不可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这一整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这一整套政治制度保证了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翁，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的政治保障。

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教科书“讲到劳动者享有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指出：“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我们讨论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从根本上讲，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是会落空的。

必须明确，一切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包括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而都有悖于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决批判这些错误思潮。（摘自《中华魂》2018年第2期，原文约6000字）

【本期关注】

## 改革开放以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实践与经验

王 爱 云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坚定地领导开展了揭露和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并且将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政权存亡的战略高度，领导全党全面掀起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经过40年的实践，党积累了一系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宝贵经验，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8~1994年：反对以“非毛化”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倾向，加强党史国史研究、宣传与教育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否定并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出现了把否定“文化大革命”变成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国家历史、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从党内来看，从1979年春党的理论务虚会到1980~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围绕着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争议，一些人借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探索，进而否定党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1979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没有给予正确反映，而是借党曾经犯过的错误来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上来看，1978年冬，北京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其中一些内容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诽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20世纪80年代末，“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继续传播，并有越演越烈之势。1988年播放的电视系列片《河殤》，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西方国家封锁的事实，丝毫不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用“封闭的篱墙”、“‘穷过渡’的贫困”、“文化专制的寂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面貌；抹黑毛泽东背离《实践论》，推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1989年春，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叫嚣要“清算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声称“中国的改革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后才能获得成功”。以“非毛化”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推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展。

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把加强党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作为一项迫切任务提上日程。

### （一）揭露和批驳“非毛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

20世纪70年代末“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刚露头，就引起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警觉。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毛化”错误思潮的政治实质“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正面回击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污蔑。1981年，中央组织理论界、文艺界开展了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1981年8月3~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明确将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潮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并揭露其危害：“一种发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错误思潮，不同于个别性质、枝节性质的错误，如果不加批评控制，却可能像某种传染病一样，危害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和安定团结，甚至产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1988年《河殤》播放后，王震等老同志迅速对《河殤》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进行批驳。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原因和危害时，深化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错误思潮的认识，明确

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并将其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全盘西化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质上指明了历史虚无主义目的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1989年9月22日，江泽民强调：“任何割断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借口‘改革’而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做法，都是错误的。”12月29日，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而我们却放松了党的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失误。”

### （二）恢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宣传党和国家历史，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

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新任务对党史国史工作提出了迫切需求，需要恢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宣传党和国家的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用正确的历史教育人，从正面澄清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歪曲的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专门的党史国史研究机构，有组织地、系统地开展党史国史研究与宣传。198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1980年5月，中央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胡乔木兼任主任，负责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传记、年谱、画册等，研究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业绩风范。1982年，中

央决定中央书记处下设党史工作小组，撤销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中央决定党史工作小组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作为主管全国党史工作的领导机构，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1990年、1994年又先后增加邓力群、胡绳两位副组长）。在领导党史工作的过程中，胡乔木非常重视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提出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1990年6月，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建议，获得中央批准。在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的过程中，邓力群明确提出国史研究要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任务。

中央党史工作机构、国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大大推动了新时期党史国史研究与宣传的发展。这些机构不仅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做出权威评述，让人们正确了解历史，而且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揭露、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党史国史的歪曲、丑化和污蔑，使党史国史研究与宣传成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阵地。

与此同时，中央注重加强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以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的渗透。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分析大学生闹事的主要原因是被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煽动时，针对青年人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的状况，提出要用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让他们懂得“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991年8月27日，国家教委颁发《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从当年秋季开始全国中小学

都加强了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高中还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讲座”必修课，重点对高中学生实施系统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教育。

1995~2011年：反对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马工程建设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人攻击十月革命、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氛围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卷土重来。1995年，旅居美国的李泽厚、刘再复所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以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的名义，提出“应当对国内国外影响很大的几次革命，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辛亥革命等重新认识、研究、分析和评价，应该理性地分析和了解革命方式的弊病”，认为“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累、非常疲倦的民族”。该书对毛泽东进行的错误分析，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一切进步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试图从历史的根源上动摇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告别革命”论相呼应，社会上还热衷于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的重新评价，称慈禧是“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被遗忘的爱国者”、袁世凯是“治世能臣”。这种所谓

“人性化新视点”，完全抛弃了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知识体系，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

### （一）领导批驳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

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极为警惕。1996年10月10日，江泽民指出，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在思想、政治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和进行渗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2006年10月11日，胡锦涛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正确的和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敏感、不研究，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史学界积极行动起来，对“告别革命”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批驳。1997年，国家教委组织刘大年、龚书铎、沙健孙等马克思主义史学专家撰写文章汇集出版了《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一书，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现代史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正确评价等方面，系统批驳《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一书的错误所在，科学阐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澄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1997年，胡绳在《百年潮》创刊号上批评“告别革命”论的谬误，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

的必要性。进入21世纪，理论界对“告别革命”论的批驳持续深入。2005年3月15日，《光明日报》特邀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四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举行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座谈，他们一致将“告别革命”论作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代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实质，并揭示其必将失败的命运，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否定革命，美化和歌颂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丑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是没有出路的。”

### （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地位

在深刻把握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特别注重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2004年4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决定组织全国最强的学术力量，编写150余种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骨干基础教材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编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史学概论》等，是历史学学科方向出版的重点教材。这些教材虽然没有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进行直接讨论和辨析，但是在编写过程中却注意反击学界和社会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体系的错误认识，

这对于加强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话语权大有帮助益。

### 十八大以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全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这引起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不论从国际战略格局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他们都不希望看到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因此，他们加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力度，以达到其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交织在一起，甚嚣尘上。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新的形式向纵深发展：一是以“历史揭秘”、“揭示历史真相”的幌子，使用经过精心裁剪的所谓“档案”、“史料”，将完整的历史现象碎片化，歪曲攻击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合法性。二是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它们脱离实际和无法实现的；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称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妄图从根本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三是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指向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对方志敏、江姐、刘胡兰等革命英雄人物进行肆意的诋毁、诬蔑，着力向社会渗透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试图搞乱普通大众的思想认识，瓦解党的群众基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政权存亡的战略高度，坚定地领导全党全社会掀起全面深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

第一，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和理论本质，号召全党进行抵制和反对。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深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要害，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政治思潮的危害还在于经常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因此，习近平揭露和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总是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发生的错误全部归结于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归结于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和性格品质等，这实际上就是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联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把个别历史人物夸大为历史主宰的英雄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习近平全面批评了这种历史观，他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

在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理论本质及其危害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反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号召，要求全党“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抵制否定中华文明、破坏民族团结、歪曲党史国史、诋毁国家形象、丑化人民群众的言论和行

为……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党的准则提了出来，要求全党“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

第二，指导意识形态思想战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宣传党和国家的历史。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阵地，从事党和国家历史研究与宣传的专家学者、工作者是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用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的方法论对待历史。习近平强调，党史国史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方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要把史料工夫做扎实，来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准确把握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2015年，中央提出扎实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阵地，筑牢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权。这是新形势下汇集力量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切实加强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批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在重大问题上澄清人们的认识误区、恢复历史本

来面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场围歼历史虚无主义的行动在全国展开。理论界、史学界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在各大报刊公开撰写发表理论研究成果，揭露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和错误所在。例如，自2015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主办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专设“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题，组织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全面批驳；中国社会科学院还陆续组织出版了《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文集，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研究、国史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所提出的种种错误观点，有的放矢，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有理有据地加以批驳，对于澄清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国史重大问题上对人们造成的思想混乱有很大帮助。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这是用法律手段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加入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队伍中来，一些长期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站、自媒体遭到人们的唾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

#### 党领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

##### （一）始终高度重视，破立并举，牢牢掌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导权

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复杂社会情况

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中，国外敌对势力常常是与国内舆论一起相互呼应，以达到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目的。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因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和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阐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党的工作大局的危害时指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安危相联系，号召全党全社会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渗透。正是从这种认识高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注重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尤其是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要求思想政治战线“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深刻批驳、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所在，及时整顿、扭转思想战线的软弱涣散态势；另一方面，坚持用史实说话，用正确的历史教育人民，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真正面目暴露在人民群众面前，其影响日渐衰微并最终被人民群众抛弃。

## （二）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理论武器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却常常以学术外貌呈现，决定了它有一套自己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历史观来说，英雄主义历史观、人性主义历史观以及价值

中立历史观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从方法论来看，片面、静止、割裂等是历史虚无主义经常采用的手法，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方法。这决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

要从根本上战胜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我们必须拿起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先，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从立场上与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其次，必须真正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和主要动力的理论以及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折射出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和探讨，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这方面，习近平身体力行，把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切实运用到对党和国家历史的分析评价中，在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提出了分清主流与支流、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等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的方法，在实践中树立了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典范。

## （三）始终警惕两种错误倾向，敢于发声亮剑，注意有的放矢

在40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有两种错误倾向值得注意。一种错误倾向认为，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是研究工作的一种“范式转换”，是一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应该允许不同学术理论观点存在；即使观点是错误的，也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不应该予以大力批判。这种看法没有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将政治问题学术化对待容易造成思想战线涣散软弱，从而放任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肆虐传播并产生危害。这种情况

在20世纪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出现过。这种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复杂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1989年东欧剧变和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本质上都是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的激化，所以，邓小平在1989年11月作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判断。但是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点被当成“左”的东西在理论界、舆论界被边缘化，致使一些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在当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防止这

种软弱涣散倾向，敢于发声亮剑，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旗帜鲜明，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

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即不注意区分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学术观点，将各种错误观点一并放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筐里进行空泛、简单的批判。这种做法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也往往达不到好的效果，容易被反批为“戴帽子”，影响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效果。1983年邓小平在指导思想战线斗争时就提出，要避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倾向，指出：“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他尤其强调，“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这也是当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应该注意吸取的经验。（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原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约16000字）

## 理直气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王玉周

历史虚无主义并非一个学术流派或一种学术观点，而是带有强烈政治倾向和政治意图的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学术研究”的主题，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们虚无历史的根本目的，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什么

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基本方法是打着“理性反思”、“重新评

价”、“还原真相”、“范式转换”等幌子，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想代替史实，大做翻案文章，企图“重新改写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了什么呢？

丑化中华民族文明史，歪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笔下，中华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逃避现实。他们认为，通过流血牺牲的方式来变革社会，是幼稚和鲁莽的；正是因为选择了革命，才使中国走向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他们看来，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狭隘民族主义”，只起到了“破坏”作用，因此应“告别革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有人指责太平天国运动“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攻击“辛亥革命搞糟了”，破坏了“一个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污蔑五四运动“把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东西截断了”。有文章甚至宣称，如果没有康梁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

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篡改新中国的发展史。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眼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是一系列“左”的错误叠加和延续的历史。有人否认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说它只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呐喊，是一朵不结果实的鲜花，没有造成重要的社会进步；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脱离“以英美为师”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主流”而误入歧途，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人甚至把指导新中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作所谓“极左教条”，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

路从根本上就错了”；有人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难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三大改造”带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发展；有人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的30年对立起来，一方面污蔑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歪曲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对“近代文明主流”的回归。

贬损革命前辈，诋毁党的领袖，抹黑英雄人物。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林则徐的爱国行动、洪秀全的革命、康梁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肆意贬损，大加否定。在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毛泽东同志是“功高盖世、罪恶滔天”。有人在文学、影视等作品中，肆意讥讽民族英雄、嘲笑革命先烈。在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大众及其领袖人物，浑身充满了错误和罪过；昔日革命对象身上倒是具有值得挖掘的闪光的东西。他们恶意抹黑各个时期具有标志意义的人民英雄，诸如周文雍、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

当然，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诚如历史学家龚书铎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虚无什么，不虚什么，说到底立场、观点问题。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的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则不虚，而是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已被纠正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已被历史定论的反动人物的所谓“进步意义”，在他们看来，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不再是腐朽愚昧的统治者形象，反

而成为了民族的英雄。

### 根本问题是中国走什么道路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党的一切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有人指责说，五四运动以来，一种从苏俄传入的“外来文化”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这从根本上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人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以此来诋毁马克思主义，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一些别有用心者拿毛泽东晚年错误做文章，对毛泽东思想肆意抹黑、彻底否定，这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必然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动摇民族精神支柱。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革命是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不可避免的选择。事实上，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曾试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但此路不通。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说明选择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近代国情的，也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广大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创造了伟大奇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进一步证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历史虚无主义者主张“告别革命”，以所谓的“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言外之意是近代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人否定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实现现代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其用意就是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有人将新中国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并互相否定，制造矛盾、制造混乱，这不仅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中国基本国情和人民基本诉求。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制度，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国家。这就是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当然，历史

上，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险恶和对事物矛盾认识的过程性，党在认识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确定战略方针、实施政策措施等方面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总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从而在领导人民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人不顾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抛开具体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质疑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人以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曲折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等。这是制造思想混乱，否定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必然性、合法性。

透过历史虚无主义的林林总总，可以看出，道路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对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错误回答。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本目的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企图把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扭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正是因为道路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历史虚无主义才竭尽其虚无历史之能事，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虚无，达到其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动摇国家和民族自信的目的。在这方面，苏联解体的教训值得深思，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 坚定道路自信，理直气壮、旗帜 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自信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也是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

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系统回答，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西方的那套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罢，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反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为当代中国指出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同样，那种封闭僵化的观念，既不能紧跟时代发展变化，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也不可能为当代中国指出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既要坚决反对那些鼓吹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宣扬主导思想多元化的错误主张，防止盲目迷信西方、一味宣扬“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否则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又要警惕那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否则党和国家便会失去活力。新时代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要坚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探索中、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是在对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上，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探索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幸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任何考验面前，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就误认为应当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借口改革开放中一些政策措施的不到位，就被别有用心的人带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

要坚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在党成立以来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奋斗和实践中确立并巩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和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体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铸造出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力量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成为了一个经受得

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党的核心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和巩固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对为什么和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近几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成就，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这些成就，使党心民心焕然一新，更加牢固地保证了党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核心领导地位。

当今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深深融入了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实践中，不可逆转地改变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整体面貌，不可逆转地改变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面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自信来自于对中国道路的自信。进入新时代，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会不攻自破。（摘自《前线》2018年第5期，原题为《坚定道路自信 理直气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约5200字）

【亲历者说】

## 我所经历的企业整顿与改革

袁宝华

从邓小平 1975 年全面整顿时起，我先在计委，后在经委，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企业整顿和改革上。1977 年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结束十年动乱后再次拉开了全国整顿企业的序幕。

### 一、恢复性整顿

整顿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刚走出来的工业企业是当时全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企业整顿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7 年到 1981 年底，是以学大庆和贯彻实施 1978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为主要内容的恢复性整顿。第二阶段是从 1982 年到 1985 年，是以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为主的全面性整顿。第三阶段是在全面整顿的基础上，以企业升级为主要形式的建设性整顿。国务院要求这一阶段的整顿从 1986 年开始到 1990 年完成。但在 1988 年，经委被撤销，这项工作就停止了。

所谓“恢复性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恢复企业的元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一是整顿领导班子，恢复企业原有领导体制，撤销革委会，恢复厂长职能。把那些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

子清除出去。同时，改正企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组织”的提法。二是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重点是恢复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严重。197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工作的通知》，要求亏损企业必须制定切实措施，限期转亏为盈，对政策性亏损也要压到最低限度，严格实行定额补贴的办法。为保证措施的全面落实，国务院决定成立扭亏增盈领导小组，谷牧任组长，姚依林、张劲夫和我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计委。恢复性整顿和扭亏增盈结合起来进行，以促使企业走上正常的轨道。三是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 年 4 月 5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建立责任制的同时，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这不仅加速了恢复整顿进度，而且也是恢复性整顿和改革的结合，为企业改革作了铺垫。

1981 年是恢复性整顿的关键一年。国家经委连续在 2~3 月、4 月、6 月及 7 月下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企业整顿问题。总结这些会议的成果，国家经委向国务院汇报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继续抓好企业恢复性整顿工作的建议：第一，整顿、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这是整顿企业的关键。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调整整顿好企业领导班子。第二，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

和按劳分配制度。第三，搞好整顿企业的基础工作，推行全面经济核算、全面质量管理。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职工队伍建设。第五，加强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要积极推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第六，整顿财经纪律。企业经营管理，要在提高经济效果上狠下功夫，纠正损公肥私、滥发奖金、截留上缴利润、拖欠贷款和偷税等问题。

同时，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六条标准：第一，有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风端正、团结战斗、精干有力、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正、副厂长懂生产技术，会经营管理。第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党委核心领导强，职工民主管理好，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工作效率高。第三，有一支觉悟高、技术精、纪律严、作风强的职工队伍。第四，建立各级责任制，完善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训。第五，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产量、质量、成本、利润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本省、区、市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第六，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职工集体福利和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和整顿企业的六条标准，要求各工业部门据此制定本行业整顿企业的具体要求。

经过恢复整顿，不仅清理了队伍，调整了领导班子，培训了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职工队伍建设，而且还强化了原始记录、计量标准和班组管理等基础工作，使企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企业的全面整顿创造了良好条件。恢复性整顿取得初步经济效果，1981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5399亿元，相比1976年的3728亿元，平均年增长7.69%。

## 二、全面整顿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我参加了中央书记处1981年12月30日对决定（草案）的最终审议会议。全面整顿重点做五件事：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二是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三是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会制度；四是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五是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决定要求在两三年时间内，全国的大中型骨干企业，能够扎扎实实地、分期分批地完成整顿任务。为此，国务院又专门成立了全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团中央、妇联等有关部门参加。我担任组长，全面负责企业整顿工作。全面整顿进行了四年，到1985年底结束。四年里，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相继召开了40次整顿工作例会。企业整顿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在1985年12月20日召开，至此，历时四年的企业全面整顿告一段落。

经过四年的全面整顿，促进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主要成果有：

一是企业整顿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完成了整顿任务。到

1985年底，列入企业全面整顿规划的近5万个预算内国营企业，验收合格率为98.9%。规划外的其他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整顿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二是企业领导班子的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实现了新老交替，开始打破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据当时对全国29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的1.8万名党政干部的统计，平均年龄45岁，其中41~45岁的占63%，基本上形成了以四十几岁的干部为主体的梯形年龄配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4%，厂长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9%，比整顿前增加40%；党委书记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到81%，比整顿前增加70%。

三是改革使整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整顿巩固了改革的初步成果，企业经济责任制不断发展完善。在学习首钢经验的基础上，以责、权、利相结合，包、保、核相联系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普遍建立健全起来。从全国情况来看，当时搞得比较活的，在大中型企业中也只占15%左右。

四是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得到了加强，企业管理现代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各种标准数量增加，水平得到提高。到1985年底，国家标准达到7500个以上，比整顿前增加1.2倍，其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占28%。县以上企业正式生产的产品，90%以上都有了标准。据当时对全国315个大中型企业的17908种产品的调查统计，90%的产品建立了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达到9.6%。实行定额管理的面有了扩大，定额水平有所提高。

五是劳动组织整顿取得初步成效。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线紧，二、三线松”的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定额面扩大，水平提高。据11个省、市部门统

计，定额面扩大6%~19%，定额水平提高5%~16%。四年间工交、建筑、商业企业初步撤出和安置富余人员300万人。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了生活劳动服务公司，开辟了生产门路，发展了第三产业。

六是职工队伍素质有所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有15个省、市的青壮年职工“双补”任务达到或接近60%的低限要求。上海、北京和江苏、辽宁的一些城市的基层企业开展全员培训的达到70%以上。各地普遍抓了青工系统教育和正规培训，先进地区已达80%以上。

七是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全面整顿促进了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建立健全了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了经济核算。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高于整顿前的水平。1985年11月与整顿前的1981年同期相比，全国工交企业总产值增长了47.5%，实现利税增长38.1%，上缴利税增长16%。扭亏工作成绩显著，国营工业企业亏损户由12598户减少到4718户，亏损面由31.1%降到12.1%。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额已由1981年的42.4亿元下降到1983年的28.6亿元，1984年11月又下降到2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1%。

八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懂企业管理、从事企业整顿工作的干部队伍。1982年8月，国家经委、中组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全面整顿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企业的正副厂长（正副经理），应该有一个年龄限制，除了特大型企业和全国性公司（如鞍钢、中国船舶总公司等）以外，正副厂长（正副经理），尽量配50岁以下的人员，最多不能超过55岁。企业党政领导班子的大部分成员应是中青年干部。要特别注意挑选一批40岁左右、德才兼备、熟悉业务、有组织领导能力的专业人

员进入领导班子。企业党委书记，需要思想政治水平高、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年龄可稍高于55岁。

### 三、扩权让利

对企业放权，从深层次讲，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1979年初，按照李先念的指示，我让经委研究室深入企业同地方一起调查研究，起草扩权条例草稿，形成了“扩权十条”建议，又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征求意见，与会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进行了认真讨论，均表示热烈拥护，经过经委党组讨论，才把“扩权十条”建议提交中央工作会议审议。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时期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扩权十条”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原则通过。应该说，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改革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部门确定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钢、北京内燃机总厂、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八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

“扩权十条”经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之后，放权让利给企业，主要是财政问题，题目就出给了财政部。财政部花了很大力气和我们反复研究，最后搞了五个文件：《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

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为了尽快推动扩权工作，在起草五个文件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作了让步，吸收了财政部的意见，所以这五个文件名义上叫扩权让利文件，实际上是扩权有限，让利也不多。1979年7月10日，国家经委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工交工作会议，研究讨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五个文件。会议对初步形成的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五个文件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7月13日由国务院颁发实行。文件规定的放权步子虽小，但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统收统支的老模式，在当时能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

有关试点情况，1980年8月9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报告中写道：从1979年到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工交部门（不包括军工企业）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为6600多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达到总产值的60%左右，利润达到总利润的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的利润达到总利润的80%以上，北京达到94%。

为使企业在人、财、物和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国家经委1981年提出了一些新的试点项目：“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试点、计划自主权试点、产品销售自主权试点、自行定价试点、企业参与外贸出口和外汇分成试点、留成资金使用自主权试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偿占有试点、企业自定内部组织设置和人员配备试点，这些试点项目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并批转各地区和

各部门贯彻执行。

总结这段工作，可以这么说，是扩权让利五个文件揭开了我国工业企业改革的序幕。通过不断地深入试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的试点形式，为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经委上报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即新的“扩权十条”。暂行规定既是前五年扩权试点经验的总结，又反映了广大企业的呼声，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肯定，明确规定了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方面拥有更大的生产经营权。新十条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一次大的突破。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与实践，我认为政府要为企业放权让利，更要为企业松绑。后来，我把解决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问题归纳为“十六条”，也有人称之为“外八条”和“内八条”。这里的“外八条”，主要是解决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一是政企分开，政府要管社会上的事。二是轻赋薄敛，严禁向企业伸手，培植国家财源。三是稳定政策。四是调整经济结构，农、轻、重，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要合理，要考虑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五是整顿市场流通秩序，严禁无序竞争、地方保护。六是对一些国营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政府要支持，增强这些企业发展的后劲。七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八是企业内外改革要配套。

#### 四、从包干到承包

包干制最早是1981年从山东搞起来

的。因为当时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年度财政计划中央、地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只能由地方先背回去。山东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背回来的任务，切块包给企业，由企业按规定完成上缴利税任务后，超产部分留给企业。这一包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可到了这年底，中央财政部门又不答应了，提出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超额部分国家要再提成。对此企业反应很强烈。为此，经国家经委与财政部反复商议，1981年12月26日出台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国家根据不同情况，对企业实行多种（共五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即“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全额利润留成”、“上缴利润包干，超收分成或留用”、“亏损补贴包干，减亏分成或留用”和“超计划利润留成”。规定还提出，不论按部门或者按企业实行，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只能采取一种办法，不能兼用两种办法，重复提取留成。这个规定比1980年1月下达的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总算又进了一步。

包干使企业有了活力，但也使财政部的管理越来越复杂。1984年7月13日，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1日起，不再批准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一律搞利改税。原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的企业，到期的，改按利改税办法执行。

首钢是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企业，首钢承包制是国务院支持搞的。1979年，国家对首钢实行的是利润留成办法，1981年7月改变分成办法，实行定额包干的承包制。当时因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支持，财政部承认首钢一家可用此办法，实际上财政部并不情愿，所以推广首钢经验他们就不赞成。首钢办法的关键是

包死基数几年不变，财政部的办法是包基数后每年得递增。由于首钢建立了与承包制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和责、权、利相结合的内部承包机制，使其对国家承包指标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证和坚实的基础，经济效益持续增长，1979~1988年连续十年实现利润平均年递增20%。

从198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承包制。这一年我用了很大的精力搞企业全面承包。当时，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承包形式也不同，但其核心都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大体有几种形式：一是“双保一挂”，也叫“双包一挂”。“双保”：一保上缴税利，如果完不成承包指标要用自有资金补；二保国家已经批准的技术改造项目。“一挂”：企业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一定四年不变。二是“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即确定上缴利润基数和递增比例，一定几年不变。三是“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即核定上缴利润基数，超额部分全部留给企业，有的按规定的比例分成。这种办法适用于那些利润不高而产品又为社会所需要、处境困难急需扶持的企业。四是“上缴利润基数（或纳税目标）包干，超收分成”。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比例进行分成或分档分成。五是“企业投入产出包干”。实行这种包干的企业有石油、煤炭、石化、冶金、有色、铁道、邮电和民航八个行业。行业内部的企业，有的也实行这种承包办法。

此外，有些地方搞了“全员承包”、“抵押承包”等。这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到了1988年，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企业承包企业”和“企业兼并企业”的形式。“企业承包企业”是经营权的转移；“企业兼并企业”是企业产权

和经营权同时转移。据河北、天津等15个省市不完全统计，实行产权转移的企业超过了600家。

1988年2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在京召开了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会议总结了1987年以来承包制的情况和经验，并将总结报告上报国务院。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从而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纳入法制化轨道。

## 五、建立经济责任制

建立经济责任制目的是使企业的权、责、利有效地结合。建立经济责任制保障了企业整顿的圆满完成，保证了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在通知中指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起钩来。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等方面建立健全明确而又具体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意见提出了随着企业扩权试点的深入，改革逐步向经济责任制方面扩展，健全和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七条原则和八项工作，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问题，二是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当时在分配方面基本有三种类型：一是利润留成；二是盈亏包干；三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意见指出，究竟采取哪种形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地确定，不搞“一刀切”，不急于定型，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改进完善。

11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如何全面理解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的奖金水平，对企业生产市场短缺的低利产品和小商品的鼓励与扶持政策，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纪律，实行经济责任制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领先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1982年10月23日，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召开了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经济责任制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必须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把责放在首位，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要体现奖勤罚懒的原则，还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完善经济责任制的重点要放在抓好落实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这个环节上。会议认为，由于工业是社会化大生产，企业与企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依存，问题比较复杂，实行经济责任制需要规范统一思想。针对这个问题，两委一部代国务院起草了《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

几个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在1982年11月8日发布通知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同时要求各地首先要重点抓好大型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工作。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经济责任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推动了经济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出现了利改税加目标管理承包、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围绕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建立经济责任制体系、经营者承包、厂长任期责任制等新内容。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突出了产品质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重要指标，分配、奖罚办法也趋向合理，既拉开了差距，又不过分悬殊等。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企业先行，其他经济的、社会的改革是后来才跟上的。因为改革就是从企业开始的，其他改革虽然在企业改革的同时也都在考虑怎么改，但是步子小、行动慢，它们没有考虑到怎么样跟企业改革同步配合，至少是考虑得不够，所以形成了企业改革孤军奋战的局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企业改革带动了其他方面的改革。（摘自《百年潮》2018年第4期，原文约19000字）

## 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林重庚口述 苏国利、吴素萍整理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或将被看

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国内外人士对这段历史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对具

体过程却缺乏详尽了解。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我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的前十多年。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份难得的殊荣。

我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那年7月，我携家人来北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华人华侨也不例外。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越南统一后不久，世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由于中国尚未恢复世行席位，与世行没有业务关系，1977~1979年间，我几次赴河内出差过境北京，都要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过境签证。国际社会并不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我们都极想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曹桂生公使的帮助下，我的家人取得签证，与我同行，但在北京只能停留三天。

抵京第二天，我意外地接到邀请，中国银行要在前门烤鸭店设宴招待我们。宴请的主人是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他是中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团长，在座的还有王连生（当时在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工作，随后成为派往世行的首位执行董事）、戴乾定（当时在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张小康（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后任中国驻爱尔兰大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我从席间的讨论中发现，调研团成员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从世行集团的“国际开发协会”获得软贷款，想了解申请软贷款的条件。当时的软贷款是无息贷款，50年偿还期。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行贷款，无论是按照市场利率的硬贷款，还是无息的软贷款，关键步骤是世行总部要派代表团对申请国进行经济考察，贷款资格取决于

经济考察的结果。为此，我们主要讨论了世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率领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程序和安排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行席位的相关事宜。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麦克纳马拉行长后来回忆访华情况时说，邓小平会见时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更快、更有效率；没有世行的帮助，也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在双方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

一个月后，世行董事会批准中国恢复世行席位。麦克纳马拉行长离开中国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中国经济调研及政策对话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我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以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 认识到引进新思想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思想创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知识封闭状态。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努力、富有勇气，也很有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界那样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下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

动力之一是：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其他国家经济进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其中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他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70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了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的过程中，引进和学习外国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引介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 理论和经验

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与中国比较相近，而且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便已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事实上，中国改革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几乎一致。所以，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很自然地始于学习苏联、东欧改革理论。学习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该院的经济研究所牵头，所里的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联、东欧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苏联、东欧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等。根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中国经济工作者的状况，并观察后来中国的情况，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以下三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首先，东欧经济学家不像中国经济学家那样脱离国外经济理论，因此他们可以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将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指出，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源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原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然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改革经验后，中国经济工作者加剧了对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机制”，都暴露出重大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中国的改革前辈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

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

再次，东欧专家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认为东欧改革经验不大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另谋改革出路。会上讨论了中国改革应采用“一揽子”方法还是分步进行，所有与会东欧专家都强烈建议“一揽子”方法。然而，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匮乏，物资储备薄弱……总之，中国总体上经济落后，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所以专家们经过各地调研最终转而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和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分步进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来自东欧、世行（包括伍德和我本人）以及中方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中国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明显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渐增多。1989年3月，国际经济学会在莫斯科召开“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圆桌会议，会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学家董辅初代表中国发言，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发展》，详尽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他分析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双轨制，又如通过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而不是国有部门私有化来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等等。我以世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身份参会，明显觉察到，除了已取得成功的中国农村改革外，苏联、东欧及西欧专家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明显有所质疑。他们认定中国改革会日渐消退，最后将如苏联、东欧一样，以失败告终。两种思路从根本上支配着苏联、东欧经济学

家：一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下，改革应依靠高技术来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市场的作用；二是在西方专家的怂恿下，后来逐渐成为主流的一种思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即实行全盘私有化，并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与之相伴，甚至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改革放在优先位置。众所周知，在随后20年里，苏联、东欧国家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来的路径，也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这一点有目共睹。

#### 世行报告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

除了学习苏联、东欧改革思想，中国还从世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中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经济考察是因为中国向世行申请贷款，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要求而进行。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5月，中国恢复世行席位。同年7月，世行派高级代表团来华，磋商启动中国业务事宜。作为代表团成员，我的任务是组建工作小组，来华进行经济考察，向世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是启动贷款项目的第一步。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世行最好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30人考察团，按行业分组，包括经济组、农业组、能源组、工业和交通组。考察时间是1980年10~12月，每个小组轮流赴中国各地一个月；考察地点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

由于几十年的对外封闭，外国专家到

中国各地考察经济情况的安排让负责接待的官员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心里没底，不知道考察团到底需要什么信息和数据，因为这可能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他们还担心考察团“另有目的”。我心里很明白，尽管中央领导已决定跟世行全面合作并开展这次经济考察，但配合我们具体工作的官员仍旧顾虑重重。为增强这些官员对世行考察团的信任，我们商定，由中方指派一个工作组，跟我们并肩工作，一起参加所有会议，凡是收集到的信息和数据，双方各持一份，报告的每一稿也都请他们过目。同时，我们请中方工作组提出他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并加入报告中。这一模式显然很成功，在随后几十年里，世行延续了这种做法，所有的经济考察团都有类似的工作组。

与世行首次考察团一起工作的中方工作组成员包括财政部的星光、朱福林，国家计委的郑立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此外，各相关行业部委也派人与考察团行业小组一同工作。跟考察团工业组并肩工作的其中一位主要的中方人员来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后来去了政府部门，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1981年3月，考察报告初稿递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报告包括主报告和多个附件，涉及统计制度、基本数据统计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对外贸易、金融、人口、卫生和营养以及教育等多个行业。6月，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正式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根据这份报告，世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首笔软贷款——大学发展项目，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行软贷款的条件。报告满足了世行中国业务的需要。

世行第二份考察报告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准备的。1983年5月26

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接见由克劳森行长率领的世行访华团，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邓小平向代表团讲述了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想法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他说，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要在1980~2000年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中国领导人请世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的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可行性研究。

遵照中国领导人的提议，世行第二次经济考察于1984年正式启动。由经济学家及各行业专家组成的这支庞大的考察队伍，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花了9周时间进行考察，地点都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1985年2月，带有6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型与预测、国际视角的经济结构及交通）的主报告草稿被提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3月，我和伍德作为报告主笔人再访北京，与中方工作小组深入讨论报告草稿，受到中央和财政部领导接见。5月，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报告尝试根据多部门模型预测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经济快速增长及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行性表示认可。报告同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尤其强调指出：以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两方面为基础的途径，与主要依靠快速工业化为基础的途径相比，增长速度虽然相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达到更好的平衡。报告还详尽分析了农业、能源、技术、交通、工业分布、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就业及社会等问题，包括收入差异、社会保障、住房以及社会服务等问题。

上述两份报告除了满足世行和中国政

府的工作需要外，也破天荒地创造了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透彻分析中国经济情况的先例。这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思想对外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有了突破。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其一，两份考察报告证明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性。其二，与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在华讲学及出版论著相比，这两份报告更多地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通过两份经济考察报告，这些工具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经济工作者坚信现代主流经济学适用于中国。赵人伟后来告诉我，当年他把世行第一份经济考察报告念给躺在病榻上的孙冶方听，除了在西部特困地区人口移民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看法外，孙冶方完全同意世行专家的意见。1985年考察报告里提出的建议，则对中国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发挥了作用。

#### “巴山轮会议”引介宏观调控 国际经验

众所周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7年，这一说法被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最终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思想已经清晰地显现出市场经济的轮廓。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就突显了这一特点。

此次会议的召开源于中国领导人的建

议。1985年初，国家体改委的廖季立约我见面。他说，体改委领导建议世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一下这些题目：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我们商定，与会国际专家需要有以上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方与会人员则应包括政府各部委参与制定政策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不能只请国际专家做演讲，而是要为中外与会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随后几个月里，我、廖季立和体改委指定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秘书长洪虎多次见面，讨论会议如何满足领导的这些要求。

1985年8月底，外国专家应邀抵达北京。8月31日，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外国专家及部分中方专家。随后，与会人员飞往重庆，并于9月2日在那里登上一艘名为“巴山”的长江游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这艘游轮上召开了，俗称“巴山轮会议”。9月9日，会议结束，游轮在武汉靠岸。

在游轮上开会，最大的限制是空间太小，只能容纳有限人数。中方参会人数因此受到严格控制。最初的中方参会人员名单只有高级领导和一些长者，经一再磋商，我们议定，与会中方人员应代表不同年龄段，遂特意预留了几个40岁以下的青年参会名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在随后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几位青年与会者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这样，中方与会人员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老年与会人员包括安志文、薛暮桥、马洪、童大林等；中年与会人员包括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等；青年与会人员包括郭树清、楼继伟等。

在与会外国专家的选择上，除了日本的小林实是中方直接邀请的以外，其他专家均严格按照中方领导提出的三个题目，有针对性地邀请：

关于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有三位专家：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因论证金融市场与消费/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及物价关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论述稳定和增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经济政策领域知名学者，曾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英国政府经济顾问、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德国著名国际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奥特玛·埃明格尔，多年担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该行是发达国家中最独立的中央银行。

关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分别在英国和德国负责放开价格管制及市场复兴工作，而且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制定反通胀措施及解除价格管制方面有着直接的经验；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的专家，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

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邀请的专家有：法国前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南斯拉夫稳定委员会、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巴伊特；美国经济学家里罗尔·琼斯，专门研究韩国经济，曾在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过。

“巴山轮会议”被公认为在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转折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很多中方与会者撰写了文章，谈论自己的感受和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此补充几点：

第一，纠正一下外界的错误印象，如前所述，并非世行主动提出组织这次会议。实际上，会议的组织，包括游轮会场的选择，都是遵照国家体改委领导指示进行的。会上安排了全体会议、小组讨论，也有一对一的会谈，无论哪种形式，都能进行到夜里。在世行工作多年，我的亲身体会是，讨论政策问题最奏效的方式是由需求驱动，进而专为满足主办国的需求而策划讨论活动。“巴山轮会议”是由需求驱动的杰出案例。

第二，尽管在1984年已经决意突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方式缺乏了解，他们尤其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盲目竞争和非指导性增长充满顾虑。“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发展到了80年代的总需求管理及宏观经济的积极应对政策。很多讨论围绕着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管理总需求，以间接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等议题进行。

第三，国家体改委领导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热。因此，宏观经济形势管理成为“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具体包括诊断经济过热、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应对问题等。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三位专家来自三个不同国家，尽管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见解不同，各自代表着经济理论的不同派别，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经济过热问题。这显然表明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核心特点，那就是它并非个人的或政治的解释。

第四，“巴山轮会议”还有一份意外收获，它对后续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国际专家有机会与中国青年经济工作者交流，聆听他们对中国改革问题发表见解。凯恩克劳斯爵士对此尤为用心，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中国未来经济改革中将大有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懂得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一代。回国后，他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提议，在该中心专门为中国设立“经济培训项目”，培训青年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需求，他们共同设计了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特点的现代宏观经济管理课程。1986~1994年，每年有5~7名具备经济学专业背景和综合潜质并已参与改革实践的年轻人，由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推荐，经世行中国代表处官员面试，在世行、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联合资助下，到牛津大学学习现代经济学课程，其中包括到英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实习，为期一年。几名学员随后继续留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约50名学员，他们绝大多数学成回国，投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工作者学习国际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主要途径，会议主题则从宏观的战略改革问题逐渐转移到更加具体的职能部门问题上，例如，世行与国家体改委于1986年联合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和1987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和组织国际研讨会”等。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外经济工作者、实践者的交流和对话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国内机构与不同的外国机构、以不同的层次及多种多样的形式组织的。其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是1993年6月在大连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也被称为“大连会议”。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了再次参与中国改革的机会，也成为我重返中国的一大契机。

#### 组建中金公司，助推国企 和金融改革

1990年，我离开世行中国代表处回到世行总部，负责西非各国事务。1993年3月，世行安排我去哈佛商学院参加“高层管理课程”。三个月的学习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了解到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比如投资银行，可以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时，我异常兴奋。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有不少经济工作者在探讨发展资本市场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许多外国金融机构也正千方百计地进入中国市场。我当即萌生了重返中国的念头，期盼着自己能在中国金融领域的迅猛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在不少中国朋友的建议和支持下，完成哈佛商学院的管理课程之后，5月28日，我写信给朱镕基副总理，提出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想法，并请求面谈。80年代考察中国经济时我便与朱镕基相识，后来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与世行代表处也有业务往来。

1993年6月10~12日，世行中国局邀请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连会议”。会议结束前一天，我接到来自北京的通知，

朱镕基副总理同意见我。于是，我启程前往北京。6月13日，在与朱镕基副总理的会见中，我们谈到了企业重组和兼并，讨论了如何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用行政手段来推动这项工作。我们还谈到了中国需要外国资本发展基础设施，以及如何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谈到了投行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朱镕基副总理说，合资投行可以提高内资和外资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改善整体市场经济中的投资决策。会见结束时，他鼓励我试着在中国创建一家合资投行。

此次会见后不久，我毅然决定重返中国，帮助组建一家合资投行。我的想法得到世行总部的支持，特准我停薪留职两年。12月17日，我向朱镕基副总理递交了设立一家合资投行的申请。文中说：“希望在中方的支持下，联合外方一些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投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可以在国际上募集巨额资金，更可以推动和帮助国有企业改革，为国家金融改革和人才培育做出示范。”这份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陈元副行长转呈。

改革试点想取得成功，中外机构能否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在公司的股权设计方面，我们决定中外双方各持股50%，这样不会一方独大。在数月的斟酌以及多方、多轮谈判后，摩根士丹利最终成为外方大股东，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外方小股东。中方大股东是中国建设银行，小股东是财政部与经贸委下属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经过近两年繁复的筹备、多轮的复杂磋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公司”）终于在1995年6月25日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获得中国首份中外合资投行营业执照。

成立至今，中金公司无疑取得了成功。担任首任总裁仅几个月后，世行特准我两年的停薪留职期限也到了，我完成了重返中国的使命，于1996年1月返回世行，直接到新德里，主管世行印度业务。

中金公司创业的功绩主要得益于首任董事长王岐山领导下的中方管理团队，他们的共同努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获得顶级国际投行技术，公司起初三年全权委托摩根士丹利进行业务管理（后延至五年），这在当时是个大胆的举措。事实证明，这一安排对实现彻底转让投行管理实务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为确保公司长远发展，在合规、风险管理、员工薪酬和激励等方面，中金公司采取了符合最先进国际惯例的市场化做法。

回顾这一历程，作为改革试点的中金公司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改革中的一次思想对外开放。当时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投行是新生事物，更何况这是一家中外合资投行。中金公司在国企改革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大大提升了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还培养了一大批投行专家，成为中国投行界的“黄埔军校”。

### 新世纪的理念和思想引进

2002年，我从世行退休。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新的挑战。几位老朋友积极鼓励我继续为中国做些政策研究，像以前一样，引介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和前沿经济思想，我欣然答应。

非营利、非政府、非机构化的“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就这样诞生了。项目研究的工作由一个顾问小组指导，顾问

们都是当年与我共事过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作用是确定研究课题，确保研究内容与中国优先考虑的经济发展问题相关。课题确定后，我们根据实际需要，邀请一组相关领域的国内外最著名的专家组成研究团队。研究方式是：中方专家介绍相关情况，外方专家介绍相关国际经验，双方并肩工作，共同完成课题报告。该项目旨在通过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促进中外学者、官员之间的交流，从国际视角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通过与国外知名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合作，提高中国经济学者、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经济政策分析、研究能力。

在中金公司董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郑国枰的积极推动下，项目的前期课题研究主要由新加坡政府资助。后期研究工作则主要由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提供资金和行政支持。这个基金会是“巴山轮会议”之后牛津大学“经济培训项目”的产物，是该培训项目师生为纪念凯恩克劳斯爵士发起成立的，宗旨与我们的研究项目恰好一致。

“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首个研究课题“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在全体顾问一致建议下启动的。2004年10月，课题报告《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问题及对策选择》完成。报告及政策建议提交到国务院后，课题组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接见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下一个课题应研究“中国与世界

经济的关系”。2006年6月，这一课题的报告《中国与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和选择》完成。在项目顾问的提议下，我们随后着手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和选择》课题报告于2007年5月递交到中财办。各项研究成果适时地以不同方式得到推广，达到了预期目的。此后几年，中财办的关切成了我们的研究方向，项目顾问鼎力支持据此确定的研究课题。

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取得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远见，他们吸收国外新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同样，也有许多国家能从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学到经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元素。（注：林重庚（Edwin R. Lin），英国籍，曾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任总裁，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事件。2018年3月，苏国利、吴素萍进一步专访林重庚，修改整理成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原文约17000字）

【史海烟云】

## 回望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

王 扬 宗

编者按：40年前，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日子里，一场盛会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王扬宗来到由山东省社科联、山东大学等联合主办的“齐鲁大讲坛”，向人们讲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后的那段历史，让我们一起聆听当年改革的先声。

### 从油画《科学的春天》说起

2004年，文化部和财政部拨了专项资金，邀请众多国内著名画家绘制了100多幅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时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21世纪初，其中有一幅就是中央美院丁一林教授绘制的油画《科学的春天》。

这幅画以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为背景，画面中，邓小平同志站在中央，边上站满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王淦昌、钱三强等等。可以说，中国当时比较著名的科学家都出现在了这个场合。

这幅画的创作者丁一林教授说，这个场景是以春天为基调，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不久，刚刚摆脱厄运的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身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蓝灰色中山装，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前共商我国科技的未来

大计，幸福的笑容绽放在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上。

这幅画于2009年完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它在国内很多地方参加巡展。美术界有关人士这样点评：“这幅画画面构图饱满，气势袭人，表现出了改革开放给科技工作者带来的乐观开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既是科学的春天，也是祖国的春天。”

当然这幅画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并没有邓小平同志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走出来、科学家们围着他这样的场面。但是这幅画又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们来看看这幅画的素材来自哪里。

据当时的报刊报道，在科学大会召开期间，邓小平、聂荣臻接见了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陈景润。

从一张科学大会期间老科学家们的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和第二批院士几乎都在其中。1955年和1957年中国科学院曾经选聘了200多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作为学部委员，到1994年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学部委员有的在“文革”期间去世了，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会，有些人拄着拐杖，也有一些人身体还不错。对比照片和油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形象和表情都绘制得非常逼真。

## “五路大军”组成中国科技力量

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的科学发展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古国，但是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起步非常晚。中国最早的现代科研机构是地质调查所，该所从1916年起开展工作。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事业。

在民国期间，通过建立现代大学以及建立包括像中央研究院那样的国家科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科技事业。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所以总的来说，民国时期虽然在科研方面，特别是地质学、生物学、动植物学这些与中国本土化有关的学科领域里，曾经取得过一些重要的成绩之外，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规模还是非常小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科技事业面貌一新，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规模，都是民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下面简单梳理一下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

在领导层面上，中央作为最高的决策层，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革”之前，曾经成立过中央科学领导小组，由周总理直接领导。改革开放以后，又成立了中央科教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出任组长。

我国的科学技术体系简单来说叫作“五路大军”。最先建立起来的，是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这个系统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大约在1958年、1959年期间，曾经达到300多个研究室，每个省都有一个科学院分院。

其次是高等教育系统。解放以前的大

学，绝大部分是不做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国内的教授一共才几百位，其中做研究的还不到1/10。在高校中开展科学研究，主要是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

第三是各行业的研究系统，包括农业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煤炭研究所、铁道研究所，等等。

第四，地方上的科技系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发展起来的，从省到县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

最神秘的是我国庞大的国防科技系统，这个系统在建立过程中吸收了很多顶尖的科学专家。

## 中国科技界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

在“文革”期间，我国的科技工作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

高等院校停止正常招生，研究生选拔、职称评定等制度都被废除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的时候，大搞开门办所、开门办科研，把大学、科研机构都下放到工厂、农村。

尤其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因此大批科学家成为改造的对象，在“文革”中更是普遍遭受迫害。

当时强调“又红又专”，其实主要强调的是红而不是专，所以曾经一度要在工农兵群众中培养科学家，建立工人阶级的科学队伍，而那些老科学家只能统统靠边站。

粉碎“四人帮”后，科技界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纠正“文革”期间这些极端的做法，来为国家科学技术的正常发展

创造条件。

1977年5月，在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的两个月前，他两次召见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提出要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尤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此后不久，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科学院主要领导人汇报全国的科技工作。华国锋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讲了一番话，他提出，要召开一个规模很大、能够肃清流毒和澄清思想、调动全国科技工作者积极性的科学大会。他还提出，要搞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给科学家们送奖状，要拍电影、拍电视，让这些科学家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可以说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 陈景润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在科学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宣传工作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为给科学大会造势，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都为科学大会题词献诗。好些省市都召开了广播动员大会，甚至组织了上百万人收听，还到处张贴宣传画，发行了有关邮票。

最轰动一时的是1978年1月作家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中国科学院当时鲜为人知的“科学怪人”陈景润一下子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陈景润当时还是一名助理研究员。在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以前，他可以说是中国科学院里最不起眼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始终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热爱的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筹备科学大会，我国的科技工作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科技界迅速恢复科研

工作秩序，建立健全有关体制，短期之内就扭转了“文革”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其间，陈景润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中科院数学所还有两位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在筹备科学大会的近10个月时间里，社会上鄙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得到了彻底扭转。从中央到各个省市，表彰了一大批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大量的科技成果。仅全国层面，就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00多项优秀科技成果，各省市、地方表彰的人数和科技成果就更多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 “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和一般偏重于学术的科学会议完全不同，它实际上是中国科技界的一次政治大会。因为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中国科技界未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针，对于随后的中国科技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议开了10多天的时间，有近6000位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为了召开这次大会，北京其他的全国性会议一律停办，因为当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住宿的地方，所以几乎北京所有好一点的饭店，统统都腾了出来招待与会者。

第一天的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除了主会场人民大会堂外，还有好几个分会场。在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

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有关知识分子的讲话深入人心，他说：“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指战员，因此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这些内容，正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正确的部分，这一席话得到了当时科技界的衷心拥护。

会上还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部分先进代表做了发言。闭幕式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广播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当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病重，所以由科委秘书胡平同志模仿他的口吻写了《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郭沫若同志只修改了其中的两处。这篇讲稿后来曾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里。

讲话稿中这样写道：“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着我国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句话画龙点睛，凸显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历史意义，为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4月2日，大会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科学家们，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因为人数太多，所以最后只能派部分代表参加合影。

### 肩负新的使命 任重道远

最后，我来说一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的科技工作开始全面对外

开放。1972年，中美关系出现变化之后，打开了中国科学界向欧美先进科技国家学习交流的大门。在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我国派出了“文革”后第一批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科学家，那是1978年4月4日，杨乐、张广厚赴瑞士参加了国际分析学术会议。

同时，我国开始向西方科技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1978年中科院招收的1000多名研究生中，有130多位培训外语后直接送出国留学。高等院校开始鼓励学生留学，国家也向高等院校下达了进修和派遣出国留学生的指标，从此开启了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大潮。正是这些留学生，其中有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包括最近这些年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通过众多的留学生回国效力，使中国的科技逐步跟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

其次，在治理体制方面，让科学家来担任有关机构的领导。中国科学院在1978年3月召开科学大会之前，任命了5位著名科学家担任副院长。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逐步由专家担任院长、校长、所长。这样，真正完成了科技工作和科技体制的拨乱反正，同时确定了新的秩序体制。

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沿着这条思路发展，到了1981年，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科技发展方针。从此，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条路线是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就开启的。筹备和召开科学大会，是以科技工作为突破口，全面实现科技工作和

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从而为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

总的来说，在中国科学大会从筹备到胜利召开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科

技界和教育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的科技界正面临着建设科技强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任，肩负新的使命，任重道远。（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5月11日，原题为《伟大的转折，科学的春天——回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约5000字）

## 中国空军发展预警机的艰难历程

陈 辉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仅仅依靠地面雷达是很难覆盖整个领空的。空中预警机探测范围广，无盲区，对小型目标探测能力强，是国土防空蓝天“火眼金睛”。它就像是一个空中指挥所，集预警探测、情报侦察、指挥控制、通信导航等功能于一体，是现代空战的法宝。

在中国预警机诞生之前，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以色列等5国已经研制成功预警机，中国是世界上第6个拥有预警机的国家。中国研制预警机经历了40多年磨难，甚至付出了众多生命的代价。一部中国研制预警机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历史，一部中国国防建设高速腾飞的历史。

### 中国空军没有预警机的被动局面

预警机的产生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珍珠港事件，由于地面和海面雷达低空盲区的存在，日军在海上和空中对美国珍珠港进行偷袭致使美国海军蒙受了重大损失。1950年初，美军

用C-14“贸易者”小型运输机和新型雷达AN/APS-82，改装成预警机。该机于1958年试飞成功，定名为E-1B“跟踪者”舰载预警机，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预警机。此后，苏联、英国、法国、以色列都研制出了预警机，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印度等国家通过购买方式也先后拥有了预警机。

中国空军早期发展预警机的设想来源于与国民党空军的拦截作战。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的防空系统处于创建阶段，存在很多雷达盲区，没有能力完全阻挡国民党空军的夜间袭扰。从1951年3月开始，中国大陆多次遭到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夜间袭扰，他们几乎畅行无阻。

国土防空作战拦截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早期预警。在没有预警机的时代，雷达是提供预警的唯一装备。新中国成立初期，空军只有很少的落后雷达，包括苏联援助的Π-3H和Π-3A米波中程雷达和美国制式的208雷达和406雷达。这些雷达的警戒引导距离仅150公里，误差约2公里。空军在1957年以前的数次作战中，由于雷达误差大，虽然能将

战斗机引导到目标附近，但是在复杂天气或夜间，空军飞行员仍然无法利用肉眼发现目标。

1955年，空军共出动246架次拦截窜扰大陆的国民党军飞机，仅有20次飞行员发现了目标，其中个别人开了炮，但是无任何战果。1956年，空军从苏联引进的23部Π-20雷达和大量的Π-3雷达，在沿台湾正面构成了漫长并有很大纵深的雷达警戒网，很快就取得了战果。1956年6月22日夜，国民党军一架B-17侦察机窜扰大陆，部署在衢州的空五军Π-20雷达首次成功地引导一架米格-17战斗机进入了目视距离，将其击落在江西上饶地区的山谷中。8月22日夜，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Π-20雷达又引导米格-17战斗机，将一架美军P4M-1Q电子侦察机击落。11月10日夜，杭州的Π-20雷达第三次引导米格-17战斗机，击落了一架国民党军的C-46运输机。

随着国民党空军改变战术，在没有月光的暗夜和300~500米低空活动，Π-20雷达引导效能开始下降。1957年11月20日夜，一架国民党军B-17G侦察机从福建进入后，由于空军没有雷达引导，只能主观判断该机可能会在京广铁路西侧150~200公里的雷达空白区活动，致使起飞了18架次带雷达的米格-17战斗机全部扑空。在该机9小时13分钟的窜扰过程中，我方竟然有3小时零8分钟不知其去向，直到它窜到石家庄西65公里处，才被一台破旧的270雷达偶尔发现，数分钟后该机又消失在雷达视野外，安全返回了台湾。

此后，国民党军飞机改装为电子侦察机，具备了对雷达的电子干扰能力，空军雷达更加被动。在1959年5月前，

空军始终没有在夜间击落过国民党军窜入大陆的飞机，直到地空导弹部队的问世，才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

地面雷达的弱点明显暴露出来，发展预警机对中国空军来说势在必行。

### 中国空军早期发展预警机的曲折历程

1953年3月，苏联赠送给中国10架图-4轰炸机。空军最早类似预警机的雷达作战飞机就是由图-4改装的夜间巨型轰炸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空战轰炸机。

改装的图-4Π虽然已经具备了早期预警机的雏形，但作为夜间战斗机过于笨重，实战性不强。1960年12月19日夜，一架国民党军P2V飞机窜往张家口方向，空军起飞了3批次图-4Π轰炸机，很快利用机载雷达找到了目标，P2V几乎无法摆脱这些战斗机的扫射。不过当时的装备实在太差，其中红外瞄准具的误差几乎达到2°。在几个批次的开火追击，始终没有造成P2V致命伤。这架P2V到达山东临沂上空时，遭到空军第三批次的图-4Π的围歼射击达35分钟，强大的火力逼得P2V机组差点儿弃机跳伞，但最后它还是逃脱了。显然，改装的图-4Π不过关。

1969年9月，空军提出研制空中预警机，代号为“926飞机”，改装机仍采用图-4。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英国3个国家拥有空中预警机，中国并无合适的大型飞机适合改装，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图-4轰炸机。图-4轰炸机是苏联模仿二战时B-29螺旋桨轰炸机的作品，在当时是非常落后的机型，轰炸机空间最大的部分

是机身中段的炸弹舱，不适合人员工作和设备安装。同期苏联装备的图-128预警机，载机是图-114民航飞机，性能和适装性是图-4无法相比的。

11月25日，空军司令部发布通知，以六院为主，空一所、空二所、空军十二厂配合，抽调人员进行空中预警机的研制，5702厂生产，空三十六师执行试飞任务。要求全国各单位对“926飞机”所需材料、加工资料等全部开绿灯放行，只能倾全力配合，不得过问。

由图-4改装的载机，在背部安装庞大的雷达天线罩和支架系统之后，飞机的总阻力增加了约30%。为了增加动力，科研人员替换了图-4飞机原装的活塞式发动机，使全机动力装置的功率增大67%。此外，技术人员对载机的气动外形和结构作了修改，整个研制过程中的吹风试验超过2000次。

当时，国内对于世界预警机技术发展状况了解很少，设计理念比较落后。图-4飞机中段的炸弹舱等几个舱段全部改装成密封舱，用于安排雷达操作员和控制人员。“926飞机”主要分系统包括警戒雷达系统、数据处理系统、数据显示和控制系统、敌我识别系统、通信和数据传输系统、导航和引导系统、电子对抗系统。“926飞机”布置了多个雷达P型显示器、2个A型显示器，UHF和VHF波段的电台分别担任空地和空空通话。实质上“926飞机”只是将雷达站移到空中拓展探测范围和减小盲区，对低空目标的探测面积相当于40个Π-3雷达站的探测面积，性能与50年代早期的预警机相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预警机，但这对于当时的大陆防空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

“926飞机”于1971年6月10日首

次试飞成功，并被命名为“空警一号”。第一次带天线罩试飞，“空警一号”在空中出现剧烈的抖振现象。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攻关，抖振现象终于被排除。抖振不是“空警一号”唯一的问题，它可谓“百病缠身”。中国当时并未吃透图-4的全部技术设计，1971年首飞时，试飞过程中险情不断，主要原因是气动设计和飞机结构掌握水平低。雷达问题和指挥控制问题无法解决，彻底终结了“空警一号”。

“空警一号”采用的全是电子管系统，连指挥计算机都是用电子管晶体管混合电路，对海面低空目标的探测能力非常差。在雷达数据处理和信息传送环节上，由于缺乏实用的人机界面和信息处理技术，标图靠手，指挥靠吼，在经过近5年的试飞后，“空警一号”还是无法满足需要。

从1976年下半年开始，空军组织开展雷达抗地物与海浪杂波干扰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20日至1979年1月18日，“空警一号”组织海上试飞，效果并不明显。最终，因预警雷达的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空警一号”于1979年停止研制。

#### 中国空军进口预警机因美国搅局搁浅

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向以色列订购了“费尔康”相控阵雷达预警机。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相控阵雷达预警机，空中预警能力基本上与美国E-3预警机相当，有些性能甚至超过它，但价格只有它的1/3。

“费尔康”是以色列自行研制的先进的飞机预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安装

在很多类型的飞行平台上，比如波音 707 系列、波音 747 系列、波音 767 系列、空中客车系列、C-130“大力神”运输机系列等等。以色列准备卖给中国的预警机则是把“费尔康”系统安装在俄罗斯制造的伊尔-76 运输机上。俄罗斯在把这类飞机交给以色列时都预留了安装“费尔康”系统的空间。

“费尔康”系统包括两部分：空中侦测系统和雷达引导系统。运输机在安装“费尔康”系统后，实际上就变成了远程空战协调指挥中心，也就是空中指挥部。它可以全天候有效侦测 400 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在必要时还可以额外延长其有效侦测范围。该预警机可同时锁定 60 个目标，并在同一时间内指挥 12 批次飞机作战，其在空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将会大大牵制敌方地面力量。其最大续航时间可达 12 小时。

“费尔康”的雷达系统可以 360° 全方位侦测陆海空，并具有很强的俯视能力，即该飞机具有很强的攻击地面目标的指挥能力。此外，“费尔康”还有自动敌我识别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技术战争中的侦测系统和指挥系统是战争制胜的关键。

1996 年 6 月，中国与以色列达成由以色列帮助中国建造 4 套“费尔康”预警系统的协议。该预警系统的飞行平台选用俄罗斯生产的伊尔-76 运输机。根据协议，每套“费尔康”系统的售价为 2.5 亿美元。中方预先支付一套系统的款项，以方将在 4 年内交付第一架预警机。

中以能达成秘密协定，这要从 1996 年 3 月说起。当时台湾在进行“大选”，“台独”分子十分猖狂，大陆方面进行导弹试射，以震慑“台独”分子。美国以台湾受到大陆的导弹威胁为借口，提高

了对台湾军售的水平。当时，台湾还没有防范导弹袭击的预警能力。因此，就在中国试射导弹后的几周内，美国作出了向台湾出售 4 架 E-2T 预警机的决定。E-2T 是美国在 E-2C 预警机的基础上改装的，并在当年就向台湾陆续交货。

这样一来，中国大陆就出现了空防问题。台湾的预警能力大大超过了大陆的预警能力。美国所谓的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略平衡”，实际上就是确保台湾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优势”。

面对不利形势，就在美国作出向台湾出售预警机决定后的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决定向外界寻求购买这种系统。按说，中国可以向世界所有能够制造预警机的国家购买。现实则是能够生产预警机的 5 个国家中，中国只能从以色列或俄罗斯寻求这方面的技术，俄罗斯的 A-50 技术水平与以色列的“费尔康”相比要差。由于受“巴黎统筹委员会”（冷战时专门针对苏联、中国等进行禁运的组织）的限制，英、法等国对华军售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因此，中国不可能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技术，从美国获得该技术更是空想。

中国与以色列则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1949 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时，以色列就给予外交承认，但两国直到 1992 年才正式建交。不过，双方军事合作至少在建交 10 年前就已秘密展开。此外，中国与以色列相距遥远，双方没有直接利害冲突。

中国大陆从以色列引进 4 套预警系统之后，就有能力在 24 小时内不间断地对台湾进行预警侦测。中以预警机秘密协议达成后，1999 年 10 月，中国一架伊尔-76 运输机抵达以色列，11 月开始安装“费尔康”系统。一架伊尔-76 运输

机价格是5000万美元左右，再加上2.5亿美元的“费尔康”系统，实际价格是3亿美元左右。经过改装，一个大盘式的敏感侦察器也在机身中部顶上安装好了。1999年底，中国领导人访问以色列，还特地前去参观。

1996年6月，以色列把准备向中国出售预警机一事通知了美国，表示这笔交易中并不含有美国的技术，美国政府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美国刚刚向台湾出售4架预警机，大陆正在抗议美对台军售，美国自知理亏，也不便再说什么。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这件事情开始为美国国会所重视，在讨论对以色列2000年度军事援助计划时被提了出来。美国2000年度对以军援较以往有所增加，达到28亿美元。该方案是由美国众议院负责监督对外援助的拨款领导小组负责人共和党议员桑尼·卡拉汉提出的。卡拉汉提议：如果以色列卖给中国一架预警机，美国就从军援中扣掉2.5亿美元，卖多少架就扣掉多少个2.5亿美元。后来，美国想要完全取消对以军援。

在美国的威胁下，以色列开始动摇。2000年7月12日，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戴维营出席以、巴、美三方首脑会谈的第二天，公开宣布：“悬置”向中国出售预警机的计划。

中国不可能再从以色列获得预警机。一架飞机从签合同到交货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另外加上对飞行员的培训等，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除中国在金钱上的损失外，中国实际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时间被大大耽搁。

中国订购“费尔康”，美国为何当初并没有反对，后来为何又强烈反对呢？美国人担心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美国卷入战争，中国预警机首先引导攻击

的目标可能就是美国的军事设施、飞机、航母等。中国拥有预警机后就可以严密侦测美国航母在西太平洋上的一举一动，“费尔康”会指挥中国的进攻性武器去打击美国的军舰等。毁掉美国一艘航母就意味着美国要死掉2000人，这是美国选民所无法承受的。因此，中国拥有预警机就意味着中国具有成功打击美军目标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能力。

后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部长佩雷斯在北京结束访问前，代表以色列政府就取消向中国出售预警机一事向中国政府表示正式道歉。之后，以色列在支付给中国3.5亿美元的赔偿金后，取消了交易。2004年，以色列将原先准备出售给中国的“费尔康”雷达系统转售印度。以色列违约后，俄罗斯成为中国获取预警机的第一来源。由于以色列大大耽搁了中国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时间，中国与俄罗斯接触的速度大大加快。2000年7月18日，在以方宣布“暂停执行”预警机交易合同后不到一星期，朱镕基总理与来访的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明确向普京提出，希望购买俄制A-50E预警机，普京爽快地答应了。11月1日，俄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与朱镕基举行中俄政府首脑第五次会晤，双方敲定：俄出租2架A-50E预警机给中国，同时将售给中国5架同样型号的预警机。

俄罗斯的最新型预警机是A-50“中坚”预警机，也是俄罗斯现役预警机中的主力机型。中国于2000年中后期开始试验租用俄罗斯的A-50“中坚”预警机，一是验证俄制预警机的主要性能参数与中国空军的需要进行对比，二是同美制预警机特别是台湾拥有的E-2T空中预警机的主体性能进行对比。结果，俄方预警机达不到中方的要求。俄制预警机的

主要战术技术性能，明显不如台湾购自美国的E-2T空中预警机。A-50“中坚”预警机的电子设备落后，“人机功效环境”不如美制预警机上的好，机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机电设备，而且个个体积庞大，机内空间狭小。很快中国军方取消了购买俄制预警机的计划。

获取预警机的曲折过程坚定了中国人的奋发图强的决心。最终，中国选择了全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预警机。

### 中国空军重启预警机研制 付出血的代价

以色列停止销售“费尔康”之后，中国又放弃从俄罗斯进口A-50预警机。2002年，中国重新确定发展国产预警机，命名为“一号工程”。

首先上马的是“空警-200”，它以运-8飞机（中国仿制苏联安-12运输机生产的机型）为基础研制。“空警-200”机背上搭载了平板缝隙天线机械扫描机载预警雷达，又称平衡木预警系统。该机在2005年1月完成首次试飞。2006年6月3日，该型号第二架飞机在安徽广德县坠毁，这是空军建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军机空难事故，也是空军预警机科研、装备试验人员最惨烈的一次损失。空难后，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加快了研制“空警-200”预警机的步伐。在改进“空警-200”的过程中，更换新型座舱玻璃除霜系统和新型机组成员紧急情况报警装置，大大提高了飞机的安全性能。

预警机研制作为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技术领域、多个分系统，其研制工作浩瀚复杂、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微小环节的失误都可能迟滞研制进度，甚至导致整个研制任务的失败。因此，特别需要跨技术、跨行业、跨军兵种在时域和空域上高度复杂的协同作战，才能形成合力，攻坚克难。

在预警机研制过程中，广大参研人员从系统立项研制开始，就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六七年间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夜以继日刻苦攻关，技术人员称之为“白加黑，5+2”。巨大的工作压力，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换来的是研制进程的突飞猛进。

享有“中国预警机之父”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早在1992年，就联合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请求自主研制预警机。预警机研制这样复杂浩大的工程，国内技术储备和配套能力曾引起一些人的怀疑。王小谟始终坚持要立足于自主研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预警机对中国防空体系的重要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预警机的预先研究之中。他还结合自身几十年雷达研制的经验，意识到中国疆域广大，需要装备不同类型的预警机，很早就提出了中国预警机要走体系化的发展战略。

相控阵天线宽角扫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技术难题。为了捕捉到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威胁信息，雷达波束需要覆盖更广的方位。相控阵天线扫描角度在传统教科书上的极限是正负60°，在60°以外的范围，即使雷达能够工作，但“视力”将严重下降。科研人员大胆创新，改变角度思考问题，最终突破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使得预警机的天线扫描角度范围创造了世界之最。

中国人研制预警机历经40多年的曲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取得成功：2002年，“空警-200”和“空警-2000”预

警机开始上马研制；“空警-2000”预警机于2003年11月首次试飞成功；“空警-200”预警机于2005年1月首飞成功。

### 中国空军预警机首次亮相震惊世界

2009年10月1日，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空警-200”、“空警-2000”两款我国自主研发的预警机在天安门上空首次亮相，引起世界注目。中国预警机首次亮相就跻身世界先进预警机的行列。

“空警-200”预警机是中国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公司自行研制的一种中型预警机。“空警-200”的平台是中国运-9运输机，搭载“平衡木”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空警-200”预警机的“平衡木”雷达系统为中国自行研制。“空警-200”预警机实际上是运-8AEW的改进型。最初，该机被命名为“平衡木AEW”（5号方案）。随后，又被命名为运-8/F200。

“空警-200”的研制是技术难度极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方案论证、细节设计、工艺准备、生产试制、试验试飞、设计鉴定等阶段。在“空警-200”的研制中，研究人员编制了40余份设计方案和66份顶层文件，开展了全部固定翼飞机专业的设计与改进工作，攻克了12项重大关键技术，进行了47项型设计和工艺试验，以及10项大型飞行试验，累计飞行近2200架次。

“空警-200”预警机，在原载机基础上重新设计机头，左右机翼翼尖和垂尾顶端加装电子对抗天线，机背上加装“平衡木”天线罩及支架，针对预警机使用要求，还对机体内部进行了较多的

改动。陕飞公司为“空警-200”新研制了机翼结构整体油箱等部件，改进设计了发动机等系统，完成了燃油等系统试验和调整试飞。2005年1月14日，“空警-200”预警机完成了第一次试飞。随后，中国加快了“空警-200”预警机的研制步伐。“空警-200”预警机于2006年1月转场交付部队试用。

“空警-200”可全天候、全疆域使用，能在粗糙、松软的野战机场或地面起降，适用范围广；载油量大、小时耗油率低，续航能力较强；使用效能高，飞行信息感知清晰、明了；飞行自动化水平较高。主要用于承担空中巡逻警戒任务，弥补地面雷达低空盲区，兼顾对航空兵实施指挥。探测、监视、跟踪和识别来袭的空中目标、水面目标等，进行战场态势监控，指挥引导己方部队实施作战。“空警-200”预警机可以与“空警-2000”预警机一起形成一低一高、一防一攻、一辅一主的合理搭配，是中国预警探测与指挥系统的骨干系统化装备。

“空警-200”可以自动或手动与“空警-2000”进行情报信息交换和共享。“空警-200”预警机的功能虽不如“空警-2000”强大，但系统造价相对便宜，可大批量生产，与“空警-2000”预警机形成低高搭配的配置方式。“空警-200”的外号叫“平衡木”，用于战术预警。

“空警-200”预警机从研制到生产都是由中国自主完成的，填补了中国预警机的空白，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少数国家对中国预警探测飞机的技术封锁。中国还将4架预警机出口到巴基斯坦。

“空警-2000”比“空警-200”更为先进。“空警-2000”采用伊尔-76大型运输机作为载机，乘员10~15人。它的雷达天线是固定不动的，采用的是比美、

俄领先一代的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

“空警-2000”的基本功能是空中预警。其装备的有源相控阵三坐标雷达，采用固定式碟形天线。它以电子扫描的方式进行目标探测，较传统的旋转式扫描雷达，可对目标实施不间断跟踪，跟踪速度快，准确率高，其目标探测可以达到360°全方位覆盖，能够跟踪、探测数百个空中、地面、海上目标，引导数十批目标，探测距离、角分辨率等性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应空情数据刷新率远高于美国E-3型预警机。

“空警-2000”预警机不仅是空军重要的电子侦察与作战平台，而且是空中指挥平台。它能在较大的范围内全面掌握空中态势，及时为各级指挥员和各种作战兵力提供态势判断，并负责将己方作战力量及时引导至有利的战术位置，以创造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的条件。战时可成为歼-10、歼-11、苏-30等中国空军主战机型实施联合作战的“空中指挥所”，将大幅提升空军的空中机动指挥水平。

“空警-2000”装备的电子侦察系统，可以探测预警雷达探测距离以外的电子辐射源，截获目标，在敌我识别系统对目标进行敌我识别后，再由信息处理系统对目标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和综合。综合后的信息既可直接显示在预警机的指挥控制台上，也可通过数据链，以语音、视频、文本等格式，或以作战态势图、作战指令等形式，分发给位于空中、

地面或海上的指挥平台，指挥、引导己方的陆、海、空作战力量对敌实施攻击。

“空警-2000”于2003年11月进行了首次试飞，2007年装备部队，2009年首次公开亮相。

中国预警机装备部队后，已初露锋芒。200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空警-200”和“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分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2014年5月23日下午3时，在“空警-200”的引导下，中国和俄罗斯军演红方舰艇编队进行联合对海突击，信息系统实时向联合指挥部、舰艇编队传输目标信息。红方在联合指挥部的精确指挥下，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多枚导弹，“击沉”蓝方1艘舰艇。

“空警-2000”装备部队以来，多次圆满完成空军组织的实兵对抗和实弹演练，并担负了第29届奥运会空中安保等任务。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空警-2000”对数量众多的救援飞机进行监管，协调各类飞机进入狭小空域。随后，又出色完成了北京防空圈的预警指挥任务。

目前世界上已有近20个国家（地区）拥有预警机，研制的预警机有十几种，在役的约有300架。中国空军预警机已经在世界预警机家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摘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

【人物春秋】

## “万方乐奏有于阗” ——毛泽东看少数民族文化

陈 晋

毛泽东比较早地接触少数民族文化，大概是1926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所长的时候。为了解不同地区的民俗风情，他曾发动来自各地的学员抄写故乡的民歌，其中就有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民歌。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颇有兴趣地说到：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后来丢了，非常可惜。毛泽东没有说他从这些民歌中懂得些什么，称其为一种国情民俗的调查，大致是可以的。

后来在长征途中，经过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毛泽东对这些民族的文化风俗有不少亲身见闻。比较集中地感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10月3日晚上，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150多名各族代表汇集中南海，举行向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献礼大会。后来人们从电影电视上常常看到毛泽东从各个少数民族代表手里接过哈达、伞、帽子等礼物的镜头，拍的就是这天的场面，其中还有他笑着接过一顶少数民族的帽子往头上戴的画面。献礼结束后，各少数民族的文工团在怀仁堂演出歌舞。参加演出的有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看节目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

让人作词，主动唱和，这在毛泽东是罕见之事。柳先生也很兴奋，即席赋一首《浣溪沙》：“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词中所说的“歌声唱彻月儿圆”，实指新疆哈萨克族民间歌舞《圆月》。柳先生还在词前附一小序：“毛主席命填是阗，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耳！”第二天，毛泽东便以《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相答：“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词中说到“万方乐奏有于阗”中的“于阗”，是指新疆西南部的一个县名，古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国名，在新疆和阗（即今和田）一带，西汉时归附中央王朝。毛泽东在词里提到它，实写新疆歌舞团表演的节目，言下之意，连古称“于阗”的偏远之地都献歌献舞，怎能不是“万方乐奏”的大团结景象呢？

有意思的是，在于阗，还确实出现一桩让毛泽东兴奋的奇事。有一个叫库尔班的老头，几次三番要骑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后来，他到了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拍下一张很有名的《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照片。后来，新疆和田根据这张照片搞了一个雕塑，记录着毛泽东和这位维吾尔族老人在一起的亲切瞬间。

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艺术，毛泽东一向主张保护和发展。1952年10月

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时提出：“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少数民族）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此前，毛泽东还托人给达赖喇嘛带去了一部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和两部电影。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1964年4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会见了中央戏剧学院新疆民族班全体学员。这年底，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他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又接见了全体代表。

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上的分裂局面，史家众说纷纷。毛泽东提出应该从促进中华民族实现更深刻统一的角度，来作辩证分析。他晚年读史，多次谈到：这期间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关于满族创建的清朝，毛泽东对其前期历史也是充分肯定的。1960年4月人大会议期间，他对老舍说，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是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有三大贡献，一是守住或收复了新疆、西藏、东北边境、台湾等地，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块版图，基

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确定了的。二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得好，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汉族的上层人士，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文化。三是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还说，康熙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还编辑科技书籍，会几种外语。这番评价，让老舍很感意外。

在文学艺术上，毛泽东很强调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的特殊性。在1956年8月24日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是自然法则”。为什么说是一个“自然法则”，毛泽东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1955年3月8日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比如，我们中国文工团，到别的国家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歌舞、戏剧，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到外国去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每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上演一些反映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常要碰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要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就引起一些议论。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请他讲讲继承遗产的问题，毛泽东说：对过去的传统剧目我们禁演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演来看看有什么可怕？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接着毛泽东笑着对在场的周信芳说：《四郎探母》还演不演？剧中肖太后是少数民族，四郎是“汉奸”，

大概对汉族有些不好看？演演是可以的。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不引发新的民族矛盾，毛泽东是支持的。

对历史题材的少数民族文艺，毛泽东始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价的。1960年10月7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看了歌剧《刘三姐》后，曾评价说：刘三姐是反压迫的，是革命的。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人物，被称为“歌仙”。明清以来，有关她的传说与歌谣文献记载很多。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财主莫怀仁欲娶她为妾，三姐坚决反抗，莫买通官府迫害三姐，三姐乘船飘然而去。歌剧《刘三姐》即以此为蓝本创作演绎的。还有一种说法，刘三姐

在广西贵县的西山与白鹤少年对歌七日化而为石。

毛泽东读史，恰巧注意到发生在广西贵县的另一桩事情。1974年1月，他同广西艺术学院教师岑云端谈话时，得知岑云端原籍是广西贵县（今属桂平市），便谈到明朝时发生在广西桂平的大藤峡瑶族农民起义。看出岑云端对这段历史不了解，又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大藤峡”三个字。据说，当地如今有计划把毛泽东书写的“大藤峡”三个字镌刻在山壁上，以为扩大旅游之用。这也算是毛泽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一件逸事。（选自《新湘评论》2018年第7期，原文约3000字）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

张 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多次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1992年“南方谈话”后，邓小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是其中之一。

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提到：“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在以往对四项基本原则不断阐释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四大后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情况，作出的新思考新论断。

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邓小平提到的“那个讲话”，指的是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所作的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时隔14年，邓小平依然认为，当初“那个讲话”很对很及时，“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可以敞开来说”。邓小平的这一表示，反映了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妥协的立场和态度，彰显了其坚定的政治自信。

邓小平不是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改革开放新时期，类似的情形，至少还有过两次。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软弱，丧失了阵地，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一次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着眼于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告诫：“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同时强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 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

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也有过类似的表态。

1957年1月16日，他和刘少奇召集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讨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稿，在谈到青年团的首要问题是接受不接受党的领导时说：“欧洲现在有一股风，不敢讲党的领导，好像讲了就输了理似的。”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接受党的领导是中国青年的好传统。”“不敢提接

受党的领导，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

不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输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样没有输理。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当时，一些地方在党的宣传工作上，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进行有力的斗争。针对这种现象，邓小平多次提出严肃批评。他反复强调，一定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一定要“用巨大的努力”“作坚决的斗争”；对一些人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一定要“严肃处理”。

邓小平本人就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典范。翻阅他的文选、文集、年谱、传记，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深入阐释而又充满感情的话语比比皆是。他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他又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多次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总结自己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生涯，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

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某些人企图动摇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严正警告说“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1986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有人不赞成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文件中。原本不准备讲话的邓小平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邓小平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坚定表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南方谈话”中，他更是充满自信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他谆谆告诫：“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搞清楚过，现在搞清楚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要判定输赢？赢家一定会是社会主义。

#### 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邓小平强调“不输理”，旗帜鲜明坚定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稳定政治局面的形成，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指出，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大张旗鼓讲党的性质、讲党的宗旨、讲党的传统、讲党的作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大张旗鼓讲、理直气壮讲、坚持不懈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含糊其辞。他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别有用心的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澄清和纠正，就会以讹传讹，反倒让世人觉得我们输了理似的”。因而，要主动发声，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要及时反驳，让正确的声音盖过它们。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重温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的强调和坚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5月22日，原文约3200字）

【海外反应】

##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七种叙事

戴维·凯利

“中国政策”(China Policy)是一家位于北京的外资研究咨询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内部有关各种公共政策问题的舆情并对之进行分析,该机构负责人兼首席研究员戴维·凯利(David Kelly)2018年2月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发表了题为《七种中国》(Seven Chinas)的观察报告。网站配发“编者按”指出,对于中国在全球事务的角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将中国视为和平崛起的力量,称其致力于成为建设性的利益相关者;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在挑战现状,包括既有的准则和美国的地位。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并不存在坐实这两种非此即彼的结论的明证,也不能像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那样简单地用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二者之一的框架来分析中国。应当认识到,影响中国行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戴维·凯利通过分析中国多元的身份认同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框架,并分析了这些认同如何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得以表现。以下为戴维报告的全文摘编。

外交政策是中国传统上最具共识色彩的政策门类。近年来,随着贸易和投资的“走出去”,公共外交领域开始形成,国家利益也随着新的轨道和策略的出现而有了调整。人们已熟知其中一些宏观的塑造力量,包括大国民族主义、经济资源安全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与这些典型的“现实主义”考量一样具有强大塑造力的是人们共享的叙事话语,可称之为“七种中国”。

政策的形成和调整常常会使用这七种有关中国的叙事。它们分别是:(1)自足的文明体;(2)最苦难的国家;(3)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4)多元主义的倡导者;(5)独立主权的保有者;(6)最后的男儿;(7)高边疆(High Frontier)的先行者。七种叙事有时能配合良好,有时则不然。其中一些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发展,其他一些则维护现状,当然也有其他几种可能性。

具体来看这七种叙事。“自足的文明体”是最具影响力和社会基础的一种表述。在其他文明中也能找到类似中国“天下”的概念,但中国的辽阔幅员强化了其一体自足、独特无二的观念。今天,中国仍坚持实现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本国独特的国情和文化,并在全球治理事务(中东和平、气候变化与人权等问题)中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近现代史上饱受外族入侵,相对其他同样遭受外族入侵的国家,中国所具有的文明程度和深重的历史记忆,令其创伤感也更深刻。“最苦难的国家”的叙事浸润社会之深难以想象。

在冷战时期,中国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国陈述的对外政策是与第三世界被剥削国家站在一起。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这一叙事在国际舞台的隆重登场。今天,在“南南合作”、“一带一路”、“世贸组织”、“亚投行”等概念下,中国继续发挥着第三世界领导者的作用。

虽然不算同义词,但“多边”和“多极”的概念同“多元”混杂在一起。中国

作为多元主义的倡导者这一叙事，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的叙事一样，都致力于扩大反对美国霸权的朋友圈。比起西式的“大国协调”所构想的那种临时约定性质的均势，一个多极的体系更简明、更具有感召力，它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对抗最大的霸权国家以达成平衡。随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不得不接受多极化的世界。多极化这一叙事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重要背景。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了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历史教训，后者努力通过巩固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来避免重蹈覆辙。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手段，这种教育与文化自足和苦难国家的叙事紧密相连。十九大正式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表述，同时传达着主权得到捍卫的叙事内容。这一叙事的另一作用在于反对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作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幸存者，中国越来越主动地在国际场合运用主权话语与西方大国的批评者进行辩论。

“最后的男儿”这一叙事在很多方面得到支持。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表现出色，西方的智库分析家们也越来越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更具优越性。俄罗斯强人总统普京在外交上与中国越走越近。中国外交政策领域里的鹰派观点越来越盛。西方大国出于吸引投资的目的很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和“走出去”政策促进了全球的消费。

第七种叙事的意味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既享受着全球公共产品，同时也要守护它。中国领导人已经接受了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观念。本土的理论家们认识到，一个崛起的大国不能只扫门前雪，要参与提供全球安全这类公共品，同

时需要参与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国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又要保证该海域的自由通航，二者并不容易兼得。在参与极地开发中，中国也注意其作为全球公共品的保护者的角色扮演，它在科考中贡献的力量使其有权参与最后的经济利益分享。但是，在诸如太空、极地、公共海域乃至网络空间这类“高边疆”区域的积极作为成本不低。

上述对中国的七种解读，每一种叙事的形成都自有其历史原因。今天中国表现出的利益取向复杂的面貌，这七种叙事起着底层的构塑作用，决策也出自这些叙事背后的观念和心理。每一种叙事又同时具有现实和虚构的向度，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常常在这两个向度之间摸不清方向。

七种叙事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混合，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令人困惑的表述，例如“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有中国特色的多边大国外交”等。第二套叙事很容易同第一套叙事结合起来，以说明中国崛起之必然。其他一些组合也显示出“有择亲和性”：它们彼此配合，说得像是一个故事。根据不同的叙事组合结果，七种叙事推动形成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同方向的表现，其丰富性并非流行的建设者、挑战者的二元判分能够涵盖。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七种叙事的一贯性。有时它们彼此加强，但很多时候彼此冲突。对华外交的决策者们需要审慎地分析七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在行文发声的时候，应该从七种叙事的事实面而非虚构面出发，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它们的影响，进而整合出逻辑一致的结论。中国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则应当清楚地向世界表达其利益诉求，而不是全然中国式的表述方式。（摘自《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原文约2600字）

【报刊荟萃】

2018年5月14日，原文约4000字）

## 改革开放40年中国 历史学的若干沉思

杨念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的推进和发展都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大量引进密切相关，历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日益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强烈影响，改变了自身解释的格局。但随着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规范化，盲目遵循西方理论引导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中西概念之间的渗透交融始终处于纠葛状态，相关知识的辨析与讨论呈现两极对立的态势，如学术自主性的建构中“规范化”还是“本土化”，史料运用与史识涵养方面“发明”还是“发现”、“田野”还是“文本”，历史解释中的“化约论”还是“语境论”，等等。要理解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走向和经验，有必要对相互纠葛的概念进行梳理、归纳并予以辨析，进而对社会科学如何规范和影响中国史学研究做出反思，为中国史学如何从自身内部发掘论述资源、找到真正属于我们自身历史演变特色的“人文”表达方式提出设想。（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原文约10000字）

##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

时代启示

李正华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奏响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曲，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解放思想、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不断推动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摘自《学习时报》

## 人民政协职能演变与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制度化

杨东曙等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要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为核心，以人民政协职能历史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需求为主要依据。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必须建立在中国现实国情之上，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在要求。根据人民政协三大职能演变过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1949~1978年，全国政协成立，是人民政协制度建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中央对人民政协职能建设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文件为人民政协三大职能的确立提供制度保障时期；21世纪伊始，中共中央出台系列推动政协协商民主的重大举措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制度上进一步对人民政协民主进行规范时期。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就是要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全过程。（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原题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依据——基于人民政协职能演变的思考》，约7500字）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

制度逻辑与治理思维

金 磅

自1978年以来的40年，是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社会经济质态和标志性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变”。在这4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超大型经济体高速工业化的奇迹。改革从反思计划经济出发。改革开放如同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支撑着步步深入的各项重大举措，产生强有力的“杠杆”作用，有效地撬动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推动其走上加速

工业化进程。40年的改革开放回报给中国人民的是百年来苦苦追寻的梦想成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长期处于生产力落后的状态，今天，中国终于迈进了一个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新时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巨变。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改革开放新思维，需要更精心地安排新制度、新战略与新政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奋进包容，是中国40年加速工业化的历史留给新时代的最珍贵精神遗产。（摘自《经济管理》2018年第6期，原文约16000字）

###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所有制 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胡家勇

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破土而出，在“铁板一块”的所有制结构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便获得了内生动力和呈现自身的规律性。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基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我们对公有制、非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摘自《中州学刊》2018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发展研究 胡税根等

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

标和行动指南。1978~2017年，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出台了涉及事业单位改革的政策文件33项。根据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不同时期的内容和特色，可将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为初步探索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加速推进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为稳步推进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至今为深入推进阶段。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主要呈现了重视厘清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重视扩大事业单位的自主权、重视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重视加强事业单位的公益性、重视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等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事业单位改革政策的发展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切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但也还存在着政策制定的系统性较为缺乏、政策执行不到位、政策绩效评估机制不够健全和法治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从强化事业单位改革政策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政策执行的监管力度、健全改革政策的绩效评估机制、重视改革政策的法律保障等方面来完善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 社会主义革命语境下的 精神生产：政治宣传画 康丹丹等

作为视觉化的精神生产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宣传画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刻画和点缀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因其广泛的群众性和普遍性，它们也构成一个时代的缩影，勾勒出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从国家政治到个体生活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精神面貌。这一时期政治宣传画的创作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具有取得政权时期的鲜明特征，通过典型化的叙事、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和生动的图文符号，集中展现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塑造了国家形象和社会主义新人的榜样，极大地促进了政治认同，并在促进生产动员和培育新社会精神的过程中，充分发

挥了上层建筑的推动作用。政治宣传画在创作过程中,受到苏联和波兰等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极大,强调政治性高于艺术性;在传播过程中,宣传画的呈现方式更加生活化,通过视觉成像的重复和反复表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文字言说的功能,因而在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然而,政治宣传画也呈现出单一性的倾向和大众性的特征,在动员群众和形塑新社会中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其独特的宣传功能在此后的发展中并未“退场”,反映了社会精神生产的延续性。(摘自《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原文约9000字)

### 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考察

汪海波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依据改革过程在各个阶段的特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阶段:市场取向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84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2年),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3~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完善阶段(2001~2011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市场取向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2017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3期,原文约22000字)

### “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

赵树凯

农业“大包干”的政策过程,是农村改革最艰难、最关键的阶段,历时三年。1982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这场政策争执落幕。在确立农民自主选择的政策原则之前,经历了三种政策形

态:“一刀切”政策是指对于包产到户一律否定,持续时间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9月;“切两刀”政策是指分两类地区,即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要搞,持续时间从1980年9月到1981年3月;“切三刀”政策是指分三类地区,即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持续时间是1981年3月到1982年1月。这种政策变迁并非规划、设计、导演的过程,而是顺流而下、顺势而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步步紧逼,政府则节节退让。在政府退让过程中,高层领导有的主张节制农民,甚至改造农民,有的主张顺应农民、追随农民。不同意见的交锋和演变,显示了1980年代农村改革高层决策的机制和逻辑。(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原文约16000字)

###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李旭辉等

通过构建一个假设经济中的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两部门经济模型,并在增长核算框架下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采用跨度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分析探讨不同阶段(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变化。结果表明:1953~201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0.43%和14.78%。分阶段看,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截然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行政命令引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为负,而改革开放后由市场机制引导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其贡献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和户籍制度改革等诸多方面做出努力,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摘自《财贸研究》2018年第4期,原文约16000字)

## 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 “社会的历史”

李成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厘清。最为明显的即关于社会史的定位或属性问题,“专史说”者有之,“通史说”者有之,“范式说”者亦有之。“社会的历史”与其说是指称历史研究的领域或范围,毋宁说它表明了一种史学研究的策略或曰范式。在这种研究策略的指引下,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拓展了史学研究的空间,赋予了传统历史研究新的生命力。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史”和“社会的历史”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之处:一个指称研究领域,一个表示研究策略。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学科定位的探讨,并非作无谓的名实之辩,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理论自觉,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2日,原文约3300字)

## 改革开放40年:全球贫困治理 视角下的中国实践

王小林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中形成了贫困治理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贫困的多维度定义;设置跨部门的减贫机构;政府主导的循序渐进的国家减贫战略;实施利贫性增长、包容性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建立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确识别瞄准、评估、考核、问责机制;坚持自力更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但财政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要满足贫困治理的资金、物资、人力等需求,就需要建立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参与扶贫开发。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就提出“社会动员”,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已经建立起体系完整的社会扶贫动员机制。中国的社会扶贫动员机制也不同于印度、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以非政府组织(NGOs)为主的社会扶贫,我们既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等有关部门开展的“定点扶贫”,东西部地区间的扶贫协作以及国有企业参与扶贫的“老三样”社会扶贫,也有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新三样”社会扶贫力量。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在处理全球发展事务中的“软实力”。(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原文约14000字)

## 新中国成立后调整优化军事 战略布局的经验与启示

郝敬东等

军事战略布局是实施战争行动、遂行战略作战任务的支撑和依托,是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在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有效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国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要综合考察利益冲突、政策企图、力量对比、部署态势等,全面比较国家所面临的敌友形势、强与弱、战与和等,判明威胁性质、轻重缓急,把利益矛盾最大、有攻击能力、有明显政策企图和部署行动的对手看作主要威胁,作为国家军事战略布局调整优化的直接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6次划分调整军区(战区),都是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上,充分考虑军事力量实际,以有利于发挥人民解放军力量优势作为重要着眼点;作战方式作为战争形态的内核,使技术成为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的“加速剂”、“催化剂”,军事战略布局与科技因素之间形成一种本质联系;军事战略布局要以地缘条件为客观基础,利用不同地理空间提供的自然条件,对军事力量进行最佳配置,构建最优化的军事战略布局,以在战略对抗空间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军事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一直是在战

略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

军事战略布局应立足国情军情，充分借鉴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实践经验，围绕打赢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

##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 国家对外战略

时殷弘

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和主题的根本判断。在经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考验之后，邓小平提出“二十六年”对外战略方针，并通过1992年其“南方谈话”，为此后中国和平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近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

然而，20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有所作为”的战略转型更加显著，其焦点之一就是在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愈益增进自身的战略权利及权势影响，先是偏重“战略军事”调整和布局，而后施行“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并举之策，结果是既获得重大收益，亦有重要风险。非常可取的是，2016年秋季往后，部分地是为应对“特朗普冲击”，部分地是为打造接续引领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形象，再加上美国在对外合作方面的消极趋向提供的重要机遇，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近乎全面地显著温和化。中共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个“更为大力”将构成对外战略方向的长期前景。（摘自《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原文约字18000字）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

李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程度的加深，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的经济外交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并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阶段，接触性经济外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外交旨在打破经济孤立、重新接触世界，从而为改革开放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刚刚决定对外开放的中国政府对外部世界有着极高的认识热情，向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政府经济代表团，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外经济交往。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外交主要是搭建与国际经济进行沟通交流的桥梁，并逐渐了解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基本规则，体现出试探性的特点。

第二阶段，融入性经济外交。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国际经济制裁，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经济合作为“敲门砖”，先同日本改善关系，再与欧共体、加拿大等西方国际组织和国家加强交流，并最终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卓有成效的经济外交功不可没。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外交体现为强烈地学习特点，即为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不断虚心学习游戏规则。

第三阶段，参与性经济外交。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式成员，也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平等参与者，参与国际经济秩序与机制的建设，经济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以地区合作为起点，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和金融管理经验的累积，中国逐步超越参与性经济外交，开始更多地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经济领导力。

第四阶段，领导性经济外交。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的领导者。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所累，美、欧的传统领导地位遭到削弱，中国由于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开始成为和美国、欧盟并肩的三大引领者。（摘自《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原题为《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约 10000 字）

约 29000 字）

## 1999 年“炸馆”事件中的我国外交 危机决策机制与过程

刘畅等

1999 年发生的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炸馆”事件）是冷战后中美两国双边危机的高潮。该事件突然爆发，大大超乎两国决策者预料，双边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使得该事件成为冷战后中美双边危机的一次典型案例。两国决策者也都在该事件中积累了有益的危机决策经验。作为此次危机的受害者，中国面对的危机形势较美国更为严重，其决策过程也更为艰辛复杂。中国最高决策层确立的目标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维护国内稳定大局、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路线不动摇、坚定与美斗争的立场，修复甚至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但又不从根本上改变与美关系的发展势头等。中国高层的最核心决策目标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受侵犯，这就必然要求美国进行郑重道歉及严肃赔偿。在国际危机中，国家面对不确定的情境，军事、外交、经济等手段都是可能的选项。“炸馆”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可能应对措施大致可分为三类：强硬措施、温和措施、不作为。但最终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正交涉、中止双边对话、利用国内强大民意施加压力、发展对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等措施。就中国的危机决策机制和过程而言，成功原因主要在于：高层集体决策、外交部执行、其他相关部门和机构予以配合的决策机制是危机得以平息的制度保障；逐步升级、灵活反应、留有余地、保持克制的斗争策略；国家在危机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互信，成为危机管控的重要机制；坚持理性决策原则。“炸馆”事件对我们建立科学高效的外交危机决策机制的启示在于，应建立“责任导向型决策机制”，避免出现“权力导向型决策机制”，需要我们努力构建一个民主、科学、包容的决策机制。（摘自《国际关系研究》2018 年第 2 期，原题为《中国的外交危机决策机制与过程分析——以 1999 年“炸馆”事件为例》，

## 大变革中的联合国维和 行动与中国的参与

蒋振西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将“联合国维和行动”改称为“联合国和平行动”，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了“维持和平”、“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等诸多环节；二是重视发挥地区组织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三是坚持性别平等，增加妇女参与维和的力度。这与联合国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从 1990 年起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主动作为，表现出大国担当。

近年来，中国参加维和行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在 10 个维和区部署了 2642 名维和人员，其中在 8 个维和区部署了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员，在 4 个维和区部署了维和警察。中国维和部队包括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近年又增加了安全分队、维和营、直升机分队、防暴队等。多年来，联合国领导人、维和任务区特派团负责人和任务区所在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维和部队给予高度评价。

2015 年 9 月 2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国 50 周年大会。他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国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6 项措施，这是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庄严承诺。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给予高度重视，大多对此表示积极支持，但也有人对中国的动机进行质疑，宣称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为了本国私利。中国维和人员是在联合国的统一指挥下行动，执行安全防卫等任务，全力保证相关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平民的安全。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和风范，也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生动体现，是要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摘自《和平与发展》2018 年第 2 期，原文约 11000 字）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要目及摘要

### ·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

####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诸“新”的内在逻辑

柴宝勇 白少飞

〔摘要〕中共十九大报告既是中国共产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是一个逻辑严密、结构科学、系统完整的重要理论文献。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征程等诸多新提法、新判断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新成就、新矛盾揭示新时代；新时代催生新使命、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部署；新征程、新部署需要新保障。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历史逻辑

李静波

〔摘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又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中华民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进一步增强了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 新时代坚持“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葛盼盼

〔摘要〕“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台湾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对台工作做出了战略安排，主要体现在：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坚持反“台独”的政治底线。

####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石善涛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两国元首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稳定、持续、高水平发展，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指引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会发展得更加扎实、稳健和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 · 改革开放史研究 ·

#### 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影响（1978～1991年）

李愿富

〔摘要〕1978～1991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同时也是日本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和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及日本企业积极开拓、寻求新兴市场的重要时期。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

本政府主要在资金合作、技术合作与转让、解决中日贸易逆差问题等对华贸易政策方面做了积极调整；日本企业则采取在贸易渠道和贸易形式上的多样化战略，对华开展贸易型投资和技术合作等。这些政策和战略的调整还促使日本的进出口市场由美国以外地区向中国市场转移。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促进中日贸易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文化科技史研究·

### 卫生工作方针的演进与健康中国战略

姚力

〔摘要〕为人民群众创造健康幸福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的初心与使命，不断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是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战略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方针几经调整变化，由“四大方针”到以农村为重点，由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到新形势下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究其根本，为人民健康服务、防患于未然、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积极有效的卫生工作方针和经验总结。以此为指导，中国的卫生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全民健康为核心，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等内容为重点的健康中国战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

### “国防新技术协定”与中国导弹科技工业的初创

姜玉平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过仿制和改进苏联导弹，建立起自己的导弹制造体系与设计技术体系。在学习和仿制过程中，中国组建了导弹制造协作体系，兴建了研制与试验基地，培养了研究与设计队伍，并在成功仿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型设计，掌握了导弹设计的关键技术与基本规律，确立了研制程序与组织管理方法，完成了从仿制生产向自行设计的跨越，为独立研制新型号导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社会史研究·

### 供销合作社在1954年湖北水灾救灾工作中的作用述论

李学桃

〔摘要〕在1954年湖北水灾救灾工作中，供销合作社大力开展物资收购工作，改善灾民经济状况，使其能够购买各种必要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同时积极组织物资供应，保障灾区防汛抢险、灾民生产与生活及灾后重建。供销合作社将救灾与改善灾民生活、促进灾区生产恢复与发展紧密结合，不仅使救灾成为一场群众性自救运动，提升了供销合作社在群众中的认可度，增强了对群众的吸引力，促进了自身组织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声望。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体系的构建

李荣华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基础。基于黄河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认为水土保持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并领导构建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体系。这套体系从制度建设、典型树立、技术推广等方面推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走向深入，增强了基层群众的认同感。

· 外交史研究 ·

20世纪末中美航天商业发射的合作与冲突

张志会 马连轶

〔摘要〕20世纪末，中美在航天商业发射领域曾有过短暂的合作。1988年12月，两国签订了卫星发射备忘录，标志着中国长征火箭正式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1995~1996年，中国长征火箭遭遇两起发射事故。为了提高长征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竞争力，中国航天系统展开了深层次改革并提高技术，最终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但美国在1999年发布了“考克斯报告”，之后美国全面禁止了与中国在航天商业发射领域的合作。

·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研究

钟金燕

〔摘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治安保卫委员会是专群结合的重要形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治安保卫委员会团结和带动广大群众协助公安机关完成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开启了国家与群众组织在治安领域合作的先河，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治理新格局。

· 地方史研究 ·

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中的苏联因素

李 扬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规划建设“新北京”、打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是中央与北京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所聘请的中国建筑与规划专家一开始即与苏联专家在规划思路上产生了分歧。由于新政权缺乏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除启用原有的技术人员之外，邀请苏联专家进行指导、学习苏联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成为当时的现实性选择。从1953年的规划草案到1958年的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莫斯科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建议是其重要的借鉴与参照。尽管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苏联因素是影响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突出因素，其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向科学进军”高潮中的上海科技发展（1956~1965年）

王 健 贾璐阳

〔摘要〕1956年1月，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上海明确以“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作为工业建设的方针，在加快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注重依托本地的产业、人才、科研院所等优势，配合工业改组，通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推进产学研结合、培育学科和技术人才、开展技术革新等举措，积极推动科技发展。1963年，中央明确将上海建成科学技术基地。“向科学进军”高潮中上海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为新中国的工业、科技发展以及上海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 国史考订 ·

关于“三通”概念首次完整明确提出的考订

史春林 苏 萍

〔摘要〕关于“三通”这一概念首次完整明确提出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二是在1979年元旦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的；三是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时明确提出的。据对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进行查证，197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在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完整明确提出“三通”这一概念。